

## 目 錄

一、 我的出身.....	1—49
金城大夫的書齋 .....	3
讀“一年半”的時期 .....	4
沖繩的統治階層 .....	8
讀“社会主义真髓” .....	12
思想之萌芽 .....	13
母親的願望 .....	15
禿頂家譜 .....	18
故鄉——琉球 .....	22
初次進拘留所 .....	24
學法律的願望 .....	27
鹿兒島舅父之家 .....	28
日本資本主义的青年期 .....	30
第七高等学校時期 .....	34
重返沖繩島 .....	37
“貧乏物語”時期 .....	38
儲金局時期 .....	41
充當律師的書僮 .....	43
米騷動 .....	47
二、 獄中十八年 .....	51—105
富有正义感的少年 .....	53
以孝順出名 .....	55
在小学校第一次罢課 .....	56
从第七高等学校學生到代課教員 .....	57
郡公所書記 .....	58

再往东京 .....	59
参加米騒動事件 .....	60
任候補法官两个月 .....	61
律師時期 .....	62
組織日本共產党 .....	63
勞動战綫的統一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	65
早稻田大学的反軍訓鬥爭 .....	67
少年同情者 .....	68
在市谷監獄遭逢大地震 .....	69
監獄成为學習的地方 .....	72
元老派的解党論和党的強化 .....	73
因三·一五事件被捕 .....	76
佐野学等人的叛变 .....	79
公審鬥爭 .....	80
網走監獄和冰的“桂花糖” .....	85
監獄領有地的農業 .....	87
監獄的花 .....	89
做針綫活和紡綫工作 .....	90
反对侵略战争的鬥爭 .....	90
受虐待的人最能够互相理解 .....	93
親切的犯人們 .....	94
死於獄中的同志們及其他 .....	96
獄中的讀書 .....	98
成为气象預測專家的經過 .....	101
千葉、小菅、丰多摩、府中 .....	102
战争結束前後 .....	103
結尾語 .....	104



## 金城大夫的書齋

我十五歲在中学三年級，讀了中江兆民的作品“一年半”。

那時我寄居在冲繩縣那霸的舅父家裏，每天到首里的縣立中学讀書，要走三公里左右崎嶇不平的多石的山路。

內科医生金城清松租用我舅父家中正房的臨街部分開設診所。他曾在大阪学医，对呼吸器官病頗有研究，在當時營業很不錯。这位年在三十二、三歲还没有結婚的金城大夫，藏有很多經濟、歷史、文学等類的書籍，正房的樓上成了他的書齋。

金城大夫看見我受到外祖母和舅父的冷酷待遇，表示非常同情，他每月給我五角零用錢，有時看到我的衣服破爛不堪，就把他的舊西服、舊皮鞋送給我。但是最使我高兴的，却是他允許我自由出入他在正房二樓上的書齋，隨意瀏覽書籍。

我很喜欢讀歷史。到这書齋裏我也是首先翻找歷史方面的書籍，一本接着一本地閱讀。笈作元八博士的西洋歷史講義錄虽是不完整的零本，但其中叙述拿破崙和法國革命的那些部分，却使我愛不忍釋。成瀬秀雄（前东京大学教授）所著厚達千頁的“歐洲通史”也是在这个書齋裏全部讀完的。托爾斯泰的小說在我中学時代曾給予我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大部分也是在這裏讀的。在这个書齋裏还有許多通俗的医学書籍，在別人不知不覺之間，我也把这些書都讀完了。此外這裏还訂有“大阪朝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在當時是一種很進步的報紙。讀了這些日本內地的報紙，从年齡來說，我比一般人更早地關心政治、經濟、社会等問題。

有一天，我从金城大夫書齋的書箱裏找到一本用大号鉛字印的薄本子的書，封面上寫着“一年半”，裝訂很粗陋，很像現在的小冊子。我還記得，還沒有讀上三頁，我就發現在這本書裏有着我从前讀过的任何書籍中所完全沒有的東西，我被它吸引住了，就一口气把它讀完。

“一年半”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動。

這就是中江兆民的革命熱情和他向統治勢力作鬥爭的精神。通過這本書，我初次接觸到革命家的熱情，並且懂得了對統治勢力的鬥爭。

### 讀“一年半”的時期

“一年半”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官僚、軍閥的劣點，強烈地攻擊了它的專制主義、人物的愚蠢無能以及政治的腐敗墮落等，例如：批評伊藤博文不比一個僅有小聰明而輕舉妄動的事務官好多少；責罵這批人不過是一種“高級幫閒”，當然不可能懂得什麼是政治。對山縣和松方也都是以同樣的口气加以尖銳的批評。書名所以叫“一年半”，是因為兆民患了骨瘍這一類的病，被醫生宣告只能再活一年半，他在臥病時寫的。可是，過了一年半，兆民並沒有死，於是他又繼續寫了一本“續一年半”。寫完之後，他又活了一個時期。兆民一直到死，始終是這樣一個氣質剛強的人。

中江兆民那種帶着宏亮聲音的言詞，就是在四十年以後的今天，仍然在我的心中震蕩着餘韻。其主要的原由，也許在於我讀“一年半”是在我十五歲的少年時代對事物容易感受的轉變期。

我的家境貧寒，十二歲就死去了父親，為了要進中學，沒有辦法，只好寄居在舅父家裏。外祖母是掌握這家實權的人，她從事放高利貸和買賣藍靛染料從中取利。我在那裏吃飯、上學，不是無代價的，每天早晚要打掃寬大的房屋，或作些擦拭洋燈罩一

類的工作。此外，我還要替不會寫字的外祖母擔當經營高利貸和藍靛買賣的記賬員。外祖母用“合會”或放印子錢的方法，榨取窮人的零星款項。所謂放印子錢，就是早晨把款放出去晚上收回來，在這短短的一個週轉中，要勒索一分的重利。同時外祖母還利用含有多量水分的藍靛會減少分量這件事，在從沖繩的農民手中收買的時候，和賣給鹿兒島的商人的時候，從中進行雙重的剝削。對農民，則說藍靛會減少分量，照實在的斤數扣去二成付款；對商人，又以分量減少了為理由，比實在的斤數多加一成左右索價。計算和記下這些騙人的賬目，都是我這個記賬員的工作，所以我從十三、四歲的時候起，對於資本主義那種賺錢的把戲，就已經清楚地印入了腦海。更因為從討債到收“會”錢等工作，都是我的事，我更切身地了解到高利貸是怎樣殘忍地剝削窮人的。我憎恨我的外祖母，我同情從外祖母手中借錢的人們，我常對他們說：借這種錢，後來不知將落到多麼悲慘的地步！有時我還誠摯地告訴他們說，我將來一定要替他們報仇。

在學校裏，我是一個中學生，可是在家裏就同奴僕一樣。離開自己貧窮的家庭而寄居在舅父和外祖母家裏的我，和作為這家中主人的舅父比較起來，雖說同是中學生，但在待遇上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差得很多。不論是在飲食、衣服、以及說話方面都不一樣。在中學的五年中，新衣服幾乎沒有上過我的身，我盡是撿舅父用過的舊東西。因為舅父的身材比我大，所以我的衣着都是那樣又寬又大。不論在上學的路上或是學校的運動場上，如果在許多學生中間，看到有人套著一身寬大得連手脚都掩蓋了的制服、在小小的身體上頂著一個龐大的三角腦袋而來回跑著的人，那就是我了。我的頭蓋骨大而呈三角形，所以一進中學便得了“三角腦袋”這個綽號。這個“三角腦袋”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向來是穿著舅父穿舊了的木屐或草鞋。甚至在木屐或草鞋都沒有的時候，就光著腳上學。只是在上體操的時候，因為不穿皮鞋是會受到申斥的，我就穿上“體操專用”的皮鞋。不用說，

這也是舅父穿過的舊皮鞋，鞋底已有穿透了的窟窿，腳底下和光着腳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有金屬製的飯盆和別的東西不同，因為舅父總騰不出舊的來，只好用大碗來代替；在大碗裏盛好了飯，中間放上酸梅乾或鹹蘿蔔，用包袱包起來提着走。

在這家裏不斷受到舅父的欺壓，加上給外祖母當記賬員以至奴僕的工作，這樣使得我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因而把我的脾氣也漸漸弄得粗暴起來。另一方面，隨着學年的增長，從一年級到三年級，和我要好的朋友也一天天多起來了，我心裏必然地引起了擺脫這種寄居生活的念頭。一般說來，在中學時代，認真用功的學生總是躲在家裏，而粗暴愛胡鬧的學生却喜歡扔開家庭跑到外面去。我開始離開舅父的家是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離開以後，有時寄居在有錢的友人家裏擔任家庭教師的工作，有時又跑回舅父家裏，過着極不規則的生活。在這期間我結識了許多好玩的伙伴和惡少年。就在那時，正當中學四年級開始的時候，我和舅父大大吵了一場架。

記得吵架的原因，彷彿還是由於我打掃房屋不好這一類小事情。平日只要對方一動手，我也因為喜歡吵架，馬上就回手，經常總是打得不可開交。這次也是因為舅父說不上兩句話，冷不防地打了過來，所以我就立刻質問他我究竟有什麼錯處，同時回手就打。鬧到最後，舅父拿出日本刀來，我便提起棍棒對抗。這一場架打了好幾個小時，對方和我都受了傷。鬧到這樣地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在舅父家住下去了，便離開了舅父的家。以後在中學四年級這一年中我始終沒有回去過。

離開舅父的家以後，最初住在那霸的安次峯的家裏。安次峯就是現在住在神戶的井之口政雄同志的姐夫；他是我的同學，我以家庭教師的名義住在他的家裏。但是因為我這家庭教師時常喝酒胡鬧，他家裏的人，特別是他的母親感到不安，在以後的半年，我便寄居在和我有些遠親關係的京都人、當時擔任中學英語教師的岡本家裏。從中學四年級到五年級時，學校舉行

了中学生所最喜欢的东京旅行，旅行的費用，是由縣方補助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到鹿兒島的母親老家和那時已經遷到東京的父親的出生的家去。住在東京的旅館的時候，我們这一夥愛淘氣的幾個人時常聚在一起買酒喝，以學生的待遇不好為理由，大夥擁到領隊教師的房間裏去質問他，鬧了一陣，演成了一場很大的風波。回到學校以後，我立刻受到了反省處分；同時因為岡本家中不能再容留和教師吵架的學生，所以我就不得不離開那裏。可是這時候，在我離開了一年多的舅父的家中，出現了我可以重新回去的情況。因為外面一般人認為我不到舅父的家是由於外祖母和舅父行為不好，大加責難，同時舅父在二十二歲中學畢業後就結了婚，也比以前和氣得多了。五年級這一年中，我又住在舅父的家裏，第二年中學畢業，我已經十八歲了。

剛進中學的時候，我們同學最愛讀的是自然主義的文学作品。

我也喜歡讀國木田獨步和田山花袋的作品。在翻譯作品中，我熱心地讀過二葉亭四迷翻譯的俄國文学作品以及森鷗外翻譯的德國、奧地利、法國的文学作品。由於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我們也染上了許多自由主義的風氣，而慢慢地含有頹廢思想的傾向。在我的中學生活中，有一個時期，這種傾向表現得很濃厚。但是那時候我最愛讀的是托爾斯泰的作品。托爾斯泰的作品，不論哪一種，我大致都讀過。他的像“傻瓜伊凡”一類的民間故事集更是我特別喜愛的。因此當中學時代初期的我，在另一方面又是生長在很濃厚的人道主義的氣氛裏。我曾是一個熱心的富有正義感的少年。我同情那些到外祖母家來借錢的人，我感到憤慨，常誠懇地勸告他們說：“借這種重利的錢，最後不知要落到多麼悲慘的地步。千萬不要借，我在想法幫助你們，請等一下吧。”我對於壓迫窮人以及社會上一切不正當行為抱着比別人加倍強烈的反抗情緒，也是出於這種原因。



一直到中學二、三年級的時候，我的心中就是被這種人道主義和頹廢思想混合支配着的，此外還夾雜了一些輕微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在學校裏，我們對教師曾進行過很激烈的批評和鬥爭。但是並沒有發展到夠得上稱為罷課的程度。只有一次，對於一位不十分高明的英語教師激起了不滿情緒，形成了半罷課的狀態。此外我記得對於一位好吹毛求疵、滿口用紀律來壓制學生的官僚架子十足的數學教師，曾進行過幾次反抗。

這個時期（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年），正當日俄戰後，軍國主義極為橫行，體操課完全成為軍隊式的徒手操和軍事訓練。到了三年級，還是身體矮小的我，對於這種要扛着比我兩個人高的村田式大槍的軍事訓練，最感頭疼。在每年一次的野外演習時，掉隊出醜的也一定是我這個小矮子。因此我非常討厭上體操課。對於體操課這一門功課，我從來沒有得過五十分以上。我雖然討厭體操課，但對於器械操、游泳、短距離徑賽、和徒手拳等運動可都搞得蠻好。尤其是對於器械操頗有自信。不論是虎伏或其他運動，我都搞得很熟練。在學校的成績中，還有比體操更壞的一項：那就是操行。提起操行來，可憐得很，我總是在三十分左右。除掉這兩種以外，其餘各科的成績都比較好，特別是數學、地理和歷史的成績格外好，所以我的體操儘管不及格，也不容易因此而使我留級。

“一年半”就是在我這樣的生活中，在我思想發生轉變的時期中讀的。

### 沖繩的統治階層

當時的沖繩，還強烈地殘存着鹿兒島藩以來對殖民地的剝削和專制主義。這就是我的長成和生活的一切基礎與背景。

沖繩縣縣議會是正在我讀“一年半”的那一年——1909年（明治42年）四月成立的，這和日本內地一般的府、縣相比，落後

了三十年以上。

金城清松大夫的友人中，有一位叫金城時男的小學校校長，他每日到舅父家裏吃飯。以後我才知道，“一年半”這本書就是他借給金城大夫的，然後通過金城大夫的書箱到達了我的手裏。金城校長曾當選過沖繩縣縣議會的第一屆議員。

在縣議會成立以前，沖繩地方連村長也是由上面委派的。縣政府的公務人員大部分是日本內地人，只在低級職員中有極少數的人是沖繩當地人。警察局長不用說是內地人，就連小學校的教職員也都是內地人。在中學、師範學校或女子中學裏，甚至連職員以外的人員，也多半是由內地人擔任的。這樣，一種比在日本內地更為露骨的專制主義，就由這批日本內地人，作為對殖民地的鎮壓加在沖繩人的頭上。

在納稅方面，內地和沖繩也有很大的差別，沖繩人大體要繳納比內地人多兩倍以上的稅款。

內地人還在沖繩壟斷紅糖市場，像榨甘蔗似地壓榨着沖繩的農民。沖繩的土地同台灣或爪哇比較起來，本來是不適於栽培甘蔗的。那末為什麼要種甘蔗呢？因為從沖繩輸運到內地而能掙錢的，除了紅糖以外，就再沒有別的東西了。沖繩的農民不論貧農或富農，為了要繳納苛捐雜稅和購買內地的商品，勢不得不把力量集中於甘蔗的栽植方面。內地的商人乘機取巧，在植甘蔗秧的時候用高價賒肥料（中國東北的豆餅）給農民，在甘蔗還沒有收成以前，又以不合理的低價收買甘蔗，和前欠的肥料款相抵，手段真够毒辣了。

在這種毒辣的榨取手段下，沖繩人就不斷地陷於貧困的境地；因此他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對內地人抱着極強烈的反感。同時因為這種對殖民地的榨取，總是利用官方那種無恥的強權硬加在人民頭上的，所以沖繩人對官方的反抗是更加深了。讓我們舉出內地資本家和政府勢力相勾結的幾個實例看看吧。

冲繩是个孤島，所以一離開海运，就什麼也做不成。因此，誰掌握着海运誰就可以控制一切。起初，在冲繩有“大阪商船”、“鹿兒島輪船”、“冲繩輪船”三个海运公司。冲繩輪船公司是由前琉球王尙家<sup>①</sup>出資經營的小公司，只有兩條一千噸左右的船。鹿兒島輪船公司是由过去經營沿岸航行的地方資本合併組成的，後來和冲繩輪船公司一同衰落，被大阪商船公司合併。於是冲繩的海运就集中在大阪商船公司一家之手，这个公司由政府方面取得補助費單獨控制着冲繩的整个海运。

製糖公司最初也是由冲繩縣的糖業試驗所搞起來的，它購買了土地，安裝了機器，等到基礎大体奠定時，就轉賣給私營公司。这样向全面擴展起來，後來它就形成了壟斷企業。在这个公司中，縣知事、前任縣知事、內務處長、警察處長等人物都列名為大股東，這充分說明了殖民地的官僚和資本家是怎樣無恥地進行勾結。在這個製糖公司的上面，是由大阪的阿部工業公司、增田屋以及神戶的鈴木商店等內地的大資本家們操縱着。國家統治勢力和壟斷資本，上上下下这样兩重三重地勾結起來，吸吮着冲繩人民的膏血。鈴木商店和後藤新平相勾結，通過台灣的糖業，擁有龐大的產業；在冲繩，鈴木也是最大的糖商。在他們这样獲得鉅額利潤的後面，冲繩的農民，却因為受到他們的專制統治和殖民地剝削的雙重壓迫，陷入半奴隸的境地，度着像豬狗一般的悲慘生活。

此外，在官廳、學校、公共機關裏一定有內地人的專用商人混進來，他們收買會計人員等，从中揩油。我在二十一歲那年的秋天，从東京回來後，有一个時期担任过故鄉國頭郡（冲繩島本島北半部）郡公所的職員。那時我曾為檢舉这种內地專用商人和下層官吏的互相勾結的腐敗情况作过鬥爭。在這郡公所裏，担任會計的是个四十歲左右的鹿兒島人，他積壓了应付未付的

<sup>①</sup> 琉球从明朝以來一直入貢中國，在1879年被日本併吞以前，其王姓尙。

賬款足有一年多，到後來實在無法应付下去，便和我調換了工作。我檢查賬簿一看，簡直是一塌糊塗。庫存物品短少，幾乎達到影响每天工作的程度，傢具搖幌作响，值班室的被褥和毯子也破爛不堪。像上面所提到的，由於未付的賬款積压了一年多，結果成了只好等待新預算下來時才能够清还上年度積欠的一种状态，所以說，如果不变成这个样子，那倒是奇蹟了。為什麼会有这样情形呢？原來是从前的管會計的鹿兒島人，把这个郡公所一切用品的採購工作，每年都指定由一个鹿兒島人的承办商人包办。因此，不論是筆墨、紙張以及其他任何物品的價格都比市價高得多。而且在这郡公所裏消耗量最大的紙張，全都用的是舊式的日本紙。於是，必然地造成超乎需要程度以上的浪費紙張的現象。我首先辞退了鹿兒島人的承办商人，對於採購物品，採用了招商投标的办法。其次我廢止了日本紙和筆墨，讓大家使用洋紙和鋼筆。投标的結果，最貴的不过是过去價格的三分之一，賤的則不过是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左右。把日本紙改用洋紙的結果，只要从前用紙量的五分之一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對於購進一切物品，當場付以現款。这样一來，以前的負債很快就还清了，短少的物品添置上了，值班室的被褥和毯子重新縫製了，损坏的桌椅等物也修理了，此外，还綽綽有餘。郡長一面在支付傳票上蓋章，一面对这些东西都特別便宜一事感到驚訝。他說：“到底这会不会使商人受到損失呢？这样做，將來会不会有人提出什麼問題呢？”

但是問題是从郡長自己提出來的。郡長在半年以後把我革職了！理由是：“这个小伙子，搞得令人可怕！这样胡搞下去，郡公所的預算一定是要被削減的。如果繼續留在这裏，这家伙不知道还要找出什麼毛病來。”

以上只不过是冲繩郡公所的腐敗情形的小小的一部分罢了。

## 讀“社会主义真髓”

我在十七歲那年上中學五年級的時候，讀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真髓”。

因为幸德秋水中江兆民的学生，所以在他的“社会主义真髓”中比“一年半”更進一步，这正適合我的需要。在我生來第一次接觸到的这一社会主义文献裏，我偶然發現在封面的背面有著者的親筆簽名。从这本书裏我第一次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學習了他們的語言。

“社会主义真髓”在促進我的革命勇气和信心方面，是起过很大的作用的。

那時在冲繩的人民中間，也出現了程度很薄弱的政治覺醒。的確，就在由小学校長出任縣議會議員的金城時男身上，也反映着这种冲繩人民的成長。这一次，我和讀“一年半”的時候不同了，我是在这位金城縣議員的明確指導之下，讀完了“社会主义真髓”的。事情的開端是这样的：當時舉行普選的主張逐漸影响到了冲繩，引起了十七歲的我的兴趣。

反对舉行普選的主張的一派的理論是这样的：

“按照目前日本的情况，大多數人對於政治並沒有真正的認識，而且他們多數是文盲，就是訂閱報紙，也不过看看社会欄的新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实施普選，也不可能反映國民大眾的政治意見。因而賄選一定会漫無止境地橫行起來，政治的腐敗將要更加嚴重。因此，作为实施普選的前提，首先是普及教育。……”

其实，就是在今天，在我們周圍，這一類的想法仍然絲毫沒有減少。官僚和學者們特別強調这种主張，認為必須首先从教育人民着手。

在为普選而發展教育的論調下，小学从四年制延長到六年制，不过是在這時的三、四年以前。全國各地也在這時前後紛紛

成立了許多中學或女子中學。因為一般的趨勢如此，所以我也認為很有道理，傾向於反對普選派的主張。

但是金城縣議員的眼界是寬廣的。在沖繩的鄉間愛讀中江兆民和幸德秋水的他，主張立即實施普選。有一天他到舅父家來吃飯時，我把反對普選派用作理由的文盲和賄選等問題提出向他展開了辯論。於是他這樣地回答我說：

“不，這些事情是要在實踐中鍛鍊出來的，如果不做的話，永遠也是做不到的。你主張從教育着手，但是教育所灌輸的東西，在實際上的效果是薄弱的。因此還是實踐重要。通過實踐的鬥爭可以決定一切。不錯，腐化、墮落一類的事也許會不斷發生。可是由於這些事情，國民可以加深自己對政治的理解，所以就是腐化、墮落也會成為發展國民政治意識的契機的。”

但是，這樣的辯論，並沒有能夠使我折服。於是他讓我看一本書，那就是幸德秋水著的“社會主義真髓”。以此為開端，金城縣議員自是之後隨時熱心地幫助我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 思想之萌芽

“社會主義真髓”，並不是一本具有理論體系的書，而只是一本近乎中國古書中言行錄體裁的書，它蒐集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克魯泡特金這一派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並用這些人的言論來講解社會主義的意義。因而，要想從這本書中有系統地學習社會主義的理論是辦不到的。但是對於剛進中學五年級的我，這種書卻比較容易接近而又容易理解。我就從這裏開始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姓名，同時也知道了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姓名。書中刊載着這些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們最受人喜愛誦讀的詞句。

通過這本書，使我有錢人和官僚所抱的反感，獲得了從以

前的唯心性質的轉變為唯物性質的基礎。這本書中以“馬克思曰”或“恩格斯曰”開頭的詞句，我已經不再一一地記得了。但是對於統治階級的掠奪羣眾、資本的積累、統治政權和經濟的關係等理論，我却是由於這本幸德秋水著作得到了啟發並且能夠初步在理論上加以掌握，雖然這種認識還是模糊的。這使我變得比以前更加勇敢了。

在那時的回憶中，有着這樣一樁事件。閑院親王夫婦來到了沖繩，我們五年級學生都受命扛着村田式大槍在閑院親王夫婦通過的道路兩旁並排站立。在我們這個用人組成的牆壁後面，一般人們跪坐在地上。看到這兩個人打面前走過去，我對於男的方面，除了覺得他裝着一副了不起似的嘴臉外，並未引起其他感覺。但是女的方面，卻在我的眼中，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一個小小的身材上配着一個小小的臉孔；在這小小的臉孔上，簡直像粉刷牆壁似地塗着厚厚的粉。我尋思着，這像個什麼呢？啊，對了，這是隻“白老鼠”！的確，完全令人感到是隻“白老鼠”。扛着槍前來歡迎“白老鼠”，這種舉動既可笑又愚蠢。我把這個“白老鼠”的印象告訴了一個同學，於是問題就麻煩起來了。學校當局認為事件重大，甚至要開除我的學籍。但是因為我在學校的成績優良，在教師中有我的遠親岡本，以及我認識像金城大夫和金城縣議員那樣有勢力的人，所以事情就在不聲不響中不了了之。

但是，這並不是一個中學生僅僅由於頑皮或不謹慎而惹起的偶然事件，而是由於沖繩人對統治勢力反抗的一種思想，有意識地在我心中抬頭的緣故。那時對沖繩殖民地的榨取、專制，與日本內地人不同的差別待遇，內地人官吏和承辦商人的貪污腐化，以及因而發生的大多數沖繩人與下層內地人所處的奴隸地位和生活狀態等等，對於這些現象，我雖然在中心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可是用社會主義的眼光來加以分析和觀察的思想，卻已經逐漸萌芽了。在學校裏，我們和內地人的學生之間的不睦，鬧

得很嚴重，有時甚至雙方暗藏匕首互相對抗。我們對於中學教師的批評與鬥爭也進行得相當激烈。在惹起“白老鼠”事件時，正是我逐漸克服過去那種頹廢思想、無政府思想而逐漸轉向到嚴肅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時候。

但是現在再回憶到當時讀“社會主義真髓”的情形，我覺得克魯泡特金用響亮的聲音喊出的“給我們自由和麵包”的口號，對我那青年的心靈也許具有更大的魔力。在那時，和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的美麗的詞句更為我所喜愛。隨着時間的進展、經驗的積累和閱讀各種雜誌報紙，我這種幼稚的思想也逐漸成長了起來。不久之後，我已經能夠理解到讀“社會主義真髓”時所不能抓住的、比較深奧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論了。這是我到了東京以後的事。

1911年（明治44年）三月底，我從首里中學畢業後，為了要進東京神田的補習學校，我隻身離開了沖繩。由那霸經鹿兒島而到達神戶這一條航綫，是我祖父在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初期從事貿易時用雙桅的帆船往來走過的黑潮；他以沖繩為中途站，把從中國及歐洲買來的商品運到京都附近的地方去出售。我這次去東京，也是航行在這同一的黑潮上。季節正是春天——在我少年結束期種在我心中的思想種子開始萌芽的春天。那時我想作一個醫生。因為這是我的孤獨地留在故鄉的母親的唯一願望。

### 母親的願望

1911年三月底，我在沖繩的中學畢業後，就到東京去，從那霸乘船經鹿兒島到神戶，再由神戶搭火車到東京。船票連火車票一共化了七元五角錢，或者還不到八元錢。

在鹿兒島路過母親的老家時，外祖母<sup>①</sup>拿出一隻自己非常

<sup>①</sup> 這裏的外祖母指德田球一同志的外祖父的嫡妻。——譯者



寶貴的錶給我，鼓勵隻身前往東京的我說：“既是上東京去，就帶着這隻錶去吧。”我很想有一隻錶，但我更需要的是錢。所以我就回答說：“錶，我不要；不如給我點錢吧。”這樣我就拿到十元錢離開了外祖母的家。那時，我這個千里迢迢遠赴東京的人，腰包中就是這般艱窘。

當時從沖繩到內地的專門學校或大學去讀書，是一件現在不可想像的困難事情。這是因為沖繩的物價非常便宜，生活費一般有內地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夠了。在沖繩，那霸的中學生的住宿費一個月三元，加上文具紙張以及零化費用兩元，總計每月普通五元錢足夠了；但是在東京，住宿費每月就要十元，再加上其他費用，每月就得要二十元左右。當然像我這樣的学生一個月要超過十五元的話，就付不出了。在沖繩與東京之間，就是有這麼大的差別。

如果用農民們的收入來比較，那末其間的距离更大。

首先，從沖繩向內地輸出的物資，普通以大阪的行情為標準；從沖繩到大阪的運輸費用很大，加上沖繩各地和那霸之間的交通不便，運費又特別貴，因此如果在沖繩不先壓低價格，就無法競爭。內地的商品以相反的過程運入沖繩，所以沖繩的農民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得賤賣貴買。此外，沖繩的農業生產技術也遠較內地落後，漁業和其他方面都是一樣，這就使兩者間的貧富差別更加顯著。

現在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那時內地稻米每段地<sup>①</sup>的平均產量差不多已經達到兩日石<sup>②</sup>左右，可是在沖繩最多也不過一日石二、三斗，同時因為沖繩米的質量低劣，內地米與沖繩米的價格之差，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要想把稻米向內地市場輸出，根本是不可能的。因而，沖繩的農民不得不集中所有力量從事於在沖繩並不十分有利的甘蔗耕作。

① 每段約合十公畝。——譯者

② 每日石約等於 6.5 立方尺，約合 1.8 公石。——譯者

當時漁業还是用非常原始的方法經營着。漁船用的是所謂“挖心船”，这是用粗大的杉、松一類的木头鑿成的，有如南洋的独木船。这种“挖心船”，就是張起帆來也駛不出多远，並且即使能够深入海洋，因为船的容積小，也不能裝載許多漁產物。因此那時冲繩的漁業只限於沿岸捕魚，捕獲的魚類也只够供給当地人的食用；至於向外輸出，根本是談不到的。那時在內地已經有了三枝桅的捕鯨船，虽然还没有使用發動机，但已能深入远洋使用大網捕魚，並已開始使用輪船捕鯨魚了。

因为有像这样的經濟上的差別，所以在當時要送子弟从冲繩到內地的專門学校或大学讀書，並不是件普通的負擔，除了地主或是經營高利貸的商人以外，一般人是办不到的。大約在我們十年以前，我們縣裏對於到內地留学的人还給予補助費，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到了我們的那個時候，虽然也有郡公所的補助費，但这不过只限於極少數的幾个人，並且这在名义上虽是補助費，实际上並不是白給的，而是一种“貸款”性質的，所以根本不值一提。在我的故鄉國頭郡，每年也只选取兩名，因为我是中学有名愛胡鬧的人，根本就沒有被选在这兩名中的可能。

我的父親，由於祖父是鹿兒島的貿易商人的關係，在年輕的時候，曾一度進过慶应义塾。但因他是独养子，祖母總捨不得把他放在遙远的东京，所以不到一年，他就被叫回到冲繩了，以後他就不得不終生留在冲繩这个小島上。父親对这件事常引以為很大的遺憾。祖母對於过去因溺愛孩子而誤了我父親一生前程的錯誤，直到很久以後还在後悔着。因而，在我出生之後，看到我在小学的成績還不錯，父親和祖母便常說这个孩子無論如何也要送進大学，这成了他們不變的願望。父親是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去世的，但直到最後一息，他还始終夢想着要把我送進大学。祖母在我十七歲時死去，在她的遺囑中也說务必要設法把我送進大学。我中学畢業時，家中只有母親一个人，生活愈見艱難。甚至在那霸的中学讀書時，我不得不寄居在舅父家中，从事

奴僕般的勞動。在这样的情形下，母親所以想把我送到東京去升學，多半是要完成父親和祖母的遺志。

但是，在我的母親方面也有她自己的熱心的計劃。這就是說，她希望我將來成為一個醫生。

在這個時代，日本國內到處都是醫生走運，以致“求學則學醫”的風氣風靡了全國。因此只要是醫科系統的大学和專門學校招考，無論這個學校在哪裏，都有大批的投考青年湧到那裏去。就是在私立大學裏，醫科學生也佔大多數，其次才是法科。這是在文化還很低落時期的普遍的現象。在遠古時代，醫生曾是神的代理人，是帝王的智囊。最初，科學是以農業、土木、醫學開始的。在我兒童時代的沖繩，也還是這樣，一提到學問，幾乎就限定是醫學，對醫生的嚮往普通都很強烈。至於我的情況更是如此。因為在我中學時期一直在我的舅父的家裏，金城清松大夫曾和我住在一起，所以我的母親更格外希望使我成為一個醫生。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做醫生保證將來可以多賺錢，對於我的貧窮的母親來說，這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也未可知。我的貧窮的母親，抱有即使借債也要供我讀書的決心。她是懷有這樣一種希望：如果說是學醫，那末，去借學費也比較容易借到手，甚至就是在毫無辦法時，從金城大夫或是從貧婪的外祖母手中也許都可以想出一些辦法來。

因此，在沖繩讀完中學的時候，為了符合我的貧窮的母親的唯一願望，我也打算成為一個醫生。

我是在明治末年的前一年春天，櫻花正在含苞欲放的時候到達東京的。

### 禿頂家譜

往東京去的旅途上，我訪問了在鹿兒島的外祖母的家。我的家譜中有一半是和鹿兒島人有關的。我常對人說：“我的祖先是毛剃九右衛門！”這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假話。毛剃九右衛門是

在歌舞伎<sup>①</sup>中有名的近松所作的淨瑠璃古曲“博多小女郎航海”中出現的富有机智与胆量的海盜头目。

从事航海的開始，總是和海盜分不開的。而航海的兴盛和資本主义的發達又具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誰都知道，美洲大陸的發現与繞好望角航行的成功，替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天地，使行將崩潰的封建社会內在的革命因素很快地暴露出來。航海兴盛後，殖民地開闢了，資本主义就在殖民地的掠奪上面發展起來。一个國家的資本主义發達的基礎和速度，決定於这种強取豪奪是怎样大規模地進行。所以無論哪一個國家，在它的新生的暴發戶的身体裏面，都帶有靠一葉扁舟隨波逐浪殺人越貨的兇暴的海盜的血統。

日本在這一點上也沒有什麼兩樣。三菱財閥就是以長崎为中心根据地的行船出身的。如果再追溯它的根源的話，無疑地它曾經是海盜。

我的祖父，虽然比三菱規模小些，但也是从海盜一類人物中出身的。他承受了这种血統，从幕府末期至明治初年，作为以鹿兒島为根据地的貿易商人，活躍在整个日本資本主义的前期。在他的一生中，反映了日本資本主义的萌芽。所以，我非常喜欢談到我祖父的事。

在近松作的“博多小女郎航海”一曲中也寫道：“西至長崎薩摩灣，承办中國荷蘭貨，朝朝夕夕無休止，千艘船進千艘出。一日千貫又万貫，金錢飛躍銀錢舞，金色世界亦如此。”从这首淨瑠璃古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國商品冒犯着德川幕府的禁令从長崎港或薩摩海灣不断流入，在封建社会的小框子裏面，已經容納不下資產階級的發展。海盜头目毛剃擺着架子說：“在下長崎人也，名喚九右衛門，以私販中國貨物为生。”他又說：

“虎皮一百有五張，我看心發狂，

---

① “歌舞伎”是日本古典戲劇之一種。——譯者

老山人參三十斤，裝在五隻箱，  
一具亨通遇佳運，有福大家享。  
綢緞七箱二百疋，安排已停當，  
由這船裝到那船，麝香四十件，  
但願偷過巡哨眼，中途莫出險。”

由此也可以看出，近松筆下的毛剃九右衛門，便是專以破壞當時國家禁令的“走私”為職業的海盜或秘密貿易商人。說不定毛剃這個角色就是三菱祖先的結義弟兄。

我的祖父和這毛剃比較起來，在時代上接近幕府末期，已經有些近代化了。但是在祖父經營這種以沖繩為中途站採購歐洲、中國的雜貨和沖繩的砂糖與藍靛的買賣中，還殘留着和毛剃同樣的“走私”風氣，而這種“走私”風氣，與時俱進，已逐漸走向公開化和合法化的過程，因而海盜的血也變得稀薄了。所以說我是毛剃的子孫的話，並不完全是無稽之談。總之，由此可知，我的祖父在思想上是有着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的。

我的父親的妹妹——也就是我祖父的長女，在明治初年十六歲時，和舊幕府的臣下松本土木工程師結婚。松本從英國留學回來後，便進以前的遞信省工作，因為看不慣日本官廳的官僚的氣氛，又回了倫敦，以後就死在英國。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祖父的長女，以後就和她的亡夫松本的友人仙石貢再度結婚。松本和仙石都是從前遞信省的土木工程師。仙石以後成為憲政會的領袖，外號叫“雷爺”，曾當過鐵道大臣等職。

我的叔父權次郎從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當了律師，他和後來稱為日本司法界的巨頭的江木冷灰、花井卓藏等人，同是日本律師的先驅者。不過他在青年染上肺病，回鹿兒島後就死了。

前面曾提過我的父親有一個時期進過慶應義塾，就從父親和叔父等的事情看來，也可以想像出我的祖父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的人。他在鹿兒島的根據地，有好幾座倉庫和三艘雙桅帆船。並且在那霸、門司、大阪等地都設有支店。後來

大阪成为重要据點，他就逐漸放棄了鹿兒島。祖父在六十二、三歲攝的照片，到現在還保存着。從這張照片看來，光禿禿的頭頂，一看就是氣魄豪爽的。這種頭頂禿落，似乎是我家的遺傳。

我還記得多少年以後在鹿兒島的我的祖母曾這樣的說過：“川崎那些人不就是政府的御用商人嗎？把那些傢伙看成有一點人味兒都是錯誤的。如果不靠自己的力量幹，是沒有做人的價值的。”從這些話可以了解，我祖母也因為受了祖父的影響，進步思想極為濃厚。祖母所說的“川崎”就是指川崎重工業的祖先川崎一家。祖父雖比他們年齡較長，但作為同一時代鹿兒島的商人，大體上是和這川崎家門戶相當的。但是，明治維新這具有革命意義的歷史的變動，把鹿兒島的商人，分成了兩派：一派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西鄉派，另一派則與大久保派相勾結以圖擴展自己的地位。川崎家就是依附於大久保派的，完全受到政府的保護，從明治政府取得造船的權利，奠定了今天隆盛事業的基礎。我的祖父是支持西鄉派的。西鄉雖然是當時侵略主義的元兇，但是，他的冒險主義在想積極向外發展的進步人士、資產階級人士之間，卻很有聲望。這就是說，西鄉在另一方面是當時年輕的資產階級的勇士。像奠定自由黨發展基礎的江藤新平和急進分子板垣退助，全都聲援西鄉，並不是偶然的。大久保派是官僚主義派，這一派後來成為使日本資本主義急速向帝國主義發展的強大力量，他們認為在明治維新後先鞏固內部而後再向外發展是有利的，因而就選擇了這一條道路。大久保派與西鄉派之間，只有在這一點上有所差別，在本質上並沒有其他任何區別。如果認為這一派是進步的，那一派是反動的，想黑白分明地來區分這兩派，那是錯誤的。

我的祖父因為是站在西鄉這一邊，在十年戰爭時，被徹底打垮，房子被燒毀，倉庫被破壞，以後就一直敗落了下去，最後是完全沒落了。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政治與資本家的發展，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

## 故鄉——琉球

我在談到東京以前，必須在這裏略談我的生長地沖繩的自然環境。琉球的日出和日落，真是奇觀。從海面升起或沒入海面的太陽，在水平綫上，顯得又圓又大。我時常看見到沖繩來的畫家們對着這種壯麗的日出或日落的風景寫生。

在亞熱帶圍流着的黑潮，呈現深碧色，波濤洶湧，狂風怒號。但是在風平浪靜的日子，有時出現海市蜃樓的景象。

“要到琉球來，  
請把芒鞋穿，  
琉球遍地是石頭。”

以古生層和隆起珊瑚礁構成的沖繩島，多赤土、砂地及石礫，正如上面這首詩中所寫，土地是貧瘠的。全島細而長，南北長一百三十五公里，登到高一點的山上就可以鳥瞰東西兩面的海面，最狹窄的地方只有五公里寬。然而人口的密度，比較內地的農村要大得多。因為整個的琉球被亞熱帶圈的海洋包圍着，濕度高而鬱熱。由於這種關係，在沖繩多肺結核病和皮膚病，有不少人因患肺病，活不到二十五歲就死了。我原來也有弟兄五人，其中有一個妹妹在十四歲時、另一妹妹在二十二歲時死去了。沖繩的氣溫，夏天超過華氏一百度的時候很少，冬天根本不降雪。在二十年中不一定能下一次雪珠。

到如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八歲的時候曾下過四、五分鐘的雪珠。在沖繩，夜裏睡眠的時候，就是在冬天也不需要鋪褥子，普通中等的家庭，一般都不用褥子。相反地，因夏天通宵悶熱，大家却鋪了蓆子睡覺。中等以上的家庭，則使用中國涼蓆。

風在沖繩是著名的。沖繩是颱風必經之路，甚至被稱為：“暴風勝地”。其中特別是石垣島最為出名，沖繩島的風也相當厲害。每秒速度三十公尺的風是極普通的，有時超過六十公尺的並不稀罕，因而，像內地房屋那樣的構造是經不住的。這裏屋

頂上的瓦，一片片都是用石灰連在一起，在房屋四周還圍繞着比屋簷還高的綠樹籬笆。這個籬笆是用一種叫做“福樹”的樹木密植而成的，“福樹”不向旁生枝，而叢生着厚厚的橢圓形的葉子。但是，在那霸或首里那樣的都市裏，則在離屋簷六尺至一丈多遠的地方，築起一道有屋簷高的石牆。這種為沖繩街區和鄉村風光所特有的“福樹”籬笆和石牆，一面擋住了風，同時也遮蔽了陽光，所以白天在室內也是暗昏昏的。

在沖繩，不論冬夏，樹葉常青。一到二月，梅花、桃花、櫻花齊放。但這裏的花並不像內地那樣濃艷，也幾乎不結什麼果實。在沖繩種的最多的農作物是甘蔗和白薯。甘蔗是春天種，到第二年夏天收割。如種白薯，一年四季可收穫四次。富農普通一年種三次；至於不能不以白薯為主食的貧農，則在掘出白薯後的坑裏立刻又栽上新的秧，一年種四次。白薯在沖繩稱為“唐薯”，開花結實與內地不同，所以日本政府曾在沖繩進行改良白薯品種的工作。在戰爭期中及戰後，聞名一時的“沖繩第一號”就是沖繩縣政府的改良種，“農林第一號”是農林省的改良種。大米每年可收割兩次，但因水利失修，一年的收穫量還不及內地一次，品質也低劣。洋白菜、西紅柿、黃瓜、蘿蔔等類蔬菜在十二月至二、三月中也有收穫，在日本內地缺乏青菜的冬天，把這些東西從沖繩運到內地去販賣是有利可圖的，戰前，就曾這樣做過。家畜方面，豬和山羊飼養很多，漁業方面，乾鯉魚出產豐富。水菜有菠蘿和香蕉。沖繩人的體格一般都很弱小，依據過去的徵兵檢查統計：合格率比內地低百分之二左右，合格的以輜重兵佔絕大多數，砲兵等兵種極少是合格的。

從南吹起、又從北吹回的風，颳成了名護灣周圍的一片廣闊的沙灘。松樹叢生、拔海1,500尺的名護山峯，從沙灘後面俯視着海面。我出生的名護村（現已改為街），就在這山谷裏，這是國頭郡的中心，是沖繩北半部最大的村。這裏是一片沙地，光着腳走路也沾不着土，下了雨，水分也立刻被吸收進去。你如果要掘



一口井，只要淺淺地一掘，就有清水流出。山上，除松樹之外，還有杉木或野生的樟木，有的地方，更繁生着南洋的羊齒類植物。

我就生在這名護村裏，我的家原來是經營印刷所的，後來改營販賣布料、估衣、油鹽、醬、酒、紙烟等雜貨，逐漸沒落，負債纍纍。在我幼年的時候，家中還有一隻琉球帆船。當我十歲或十一歲那年，發生了一場暴風雨，暴風從南面吹來，吹斷了繫在岸上的那隻船的鎖鏈，把船吹到沙灘上，緊接着打着旋兒從北面吹回來的逆風又把它拋到海灣裏去。眼看着它快沉下去了。在這急遽地傾斜着的船面上，還可以看見我所喜愛的三個船夫的影子。但是在那狂風駭浪中，簡直無從措手來營救他們。我緊緊地扶着石牆，呆望着海面，一直到船和人都完全看不見了，嚇得半天不敢動彈。晚上，我又到石牆那裏，只看到在風還沒有停的海濱上燃燒着熊熊的火炬。

自此以後，我在日本和國外各地漫遊時，也時常想起關於琉球的壯麗的日出和日落，以及這猛烈的暴風雨。特別是想起暴風雨的時候為多。在沖繩，船隻遇險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我在那霸中學的時候，在珊瑚礁中間窄水道的海港入口處，船隻時常被暴風雨所覆沒了。有一次，也在这海港入口處，覆沒了一隻船，我的母親本來預定坐這隻船從故鄉名護到那霸來看我，所以我一夜沒有闔眼，在碼頭上等到天亮。僥倖得很，母親突然改變了計劃，並沒有搭那隻船。在琉球，因暴風雨而喪命的，在我的熟人之中，不知道有多少。

### 初次進拘留所

在東京，我起先住在四谷區內藤新宿街的叔父的家裏。我的祖母也住在一起。本來預定由叔父來照料我，但是我在那裏只住了一星期便離開了。因為叔父的家離神田的補習學校太遠，實際上他的家狹小，生活也不富裕，受他照料，感到不舒服，因而我只好離開了。可是，一想起在故鄉过着貧困生活的母親，這簡

直是过分輕举妄動了，因为这样一來，母親不得不从她的艰苦的生活中每月寄十五元錢給我。

我在本鄉區，找到一所沒有比这更坏的廉價的公寓。在三塊蓆子<sup>①</sup>大的骯髒房間裏，沒有电灯，只用洋灯來代替。尽管这样，每月房錢要付七元五角左右。母親寄來的十五元錢，一半繳了房錢，剩下來的，不管怎样節省，都不够分配。不久我也就離開了这本鄉的公寓，另在神田區猿樂街学校附近找到上級同学住的公寓，加入進去，和兩位上級同学住在一起，自己做飯。虽然是三个人住在一个六塊蓆子大的房間裏，但每月十五元依然是不够用，最後还得向友人借債。过了多少年，我做了律師以後，還不時受到舊友催討舊債，这差不多都是那時候欠下的。

準備學醫而進東京補習學校的我，在那時期最熱心學習的是“万朝報”。“万朝報”在日俄戰爭發生以前，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山泊”。可是到1903年(明治36年)秋，日俄開战的形势成为不可避免，这家報紙一变它从前一貫反战的态度，因此幸德秋水、堺枯川(即堺利彦)二人与基督教徒的内村鑑三，一同向社長黑岩周六提出辞呈，離開了該社，堺与幸德在那年秋天立即創辦了“平民新聞”，主張“反战論”。尽管如此，过了幾年之後，我在东京時，“万朝報”上还依然帶有这种堺、幸德的餘風。这在一向看慣大阪的報紙的我看來，实在是值得驚異的。在这報上有英語欄，为了投考学校需要熟讀这英語欄，也是當時我愛讀“万朝報”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報紙最吸引我的，是石川三四郎的法國、比利時通訊和森田有秋の柏林通訊。石川的通訊，報道社会主义性質的法國社会党的動向；用“鉄血生”筆名發表的森田的德國通訊，報道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動向。我非常喜愛森田的特約通訊。那時，向日本報道外國的社会主义或工人運動的動向的只有這兩种通訊。我曾經受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

① 一塊蓆子普通長約二公尺，寬約一公尺。——譯者

义真髓”的啓發，開始注意社会主义，讀了這兩種通訊，更明確地打下了進一步向社会主义發展的基础。

在我的心裏，逐漸明晰地形成了不願作医生的感觉。在那霸舅父家裏，我曾和医生一起住过，對於医生的内幕了解得很清楚，並且我要進医科学学校的决心本來就不强，只是为着滿足母親的熱望，才產生这种意圖。这种决心經過东京補習学校時代顯然逐漸發生了轉變。我一面準備着投考医科学学校，一面反把興趣的重點轉移到政治、經濟、法律的方面。

那時我是十八歲。我本來是智力早熟而身体却發育得較晚，但从这十八歲起，身体突然顯著地長大了起來。我現在身長五尺四寸五分，在冲繩人中是个高身材，从日本人的一般標準來說，也可算是中上等，這是在我到东京以後很快地長起來的。

就在这十八歲那年的除夕到次年1912年(明治45年)的元旦，發生了一件我終生難忘的事。

在这除夕的晚上，我和四、五个朋友在本鄉的一个小飯館樓上举行除夕晚会，吃了一、兩碗麵，喝了些廉價的酒，很高兴地走到街上去。外面因为除夕实行特別警戒。我就在搖搖晃晃中被警察捉住了，他問我是“幹什麼的”。我照着警察的臉冷不防向他打过去，大喝一声：“少欺負人！”於是有幾個警察从四面八方跑過來把正在撒酒瘋的我推倒地上。“年紀輕輕的学生，吃了酒居然敢打起警官來了，太不像話。”——以此為理由，我被他們連拖帶拉地帶到附近的本鄉區真砂警察局。進了警察局之後，我被他們苦苦地打了一頓。但是，因為我還用所有的力量來抵抗他們，這次他們用繩子把我的手向後反綁，綁在柱子上，用竹劍來“試鍊”我。儘管这样做，我也沒有承認錯誤，於是他們把我的身子捆上五花大綁，又用毯子把头蒙上，不是把我送到拘留所而是扔在警察局的壁櫥裏。

第二天，元旦中午的時候，我才被从这壁櫥裏提出來。全身所有的骨節都隱隱作痛，臉部和胸部也都因伤痕而變成青色了。

而且在这期間，警察也沒給我飯吃。司法主任問明了我的地址、姓名等以後說：“因为你還年輕，今天又是大年初一，所以特別寬恕你。”這樣我才獲得了“赦免”。

但是，我腰包裏一文不名，衣服襤褸，木屐也不知丟到哪裏去了。大年初一光着腳從本鄉區真砂街走到神田區的猿樂街，在下午三點左右才好容易回到公寓。公寓裏的友人和公寓主人夫婦都驚訝地迎接我。他們正因我的突然失蹤而擔心着，現在看見我又突然狼狽不堪地回來，更驚訝了。公寓主人是埼玉縣的農民，夫婦倆都是為人和藹、心地善良的人。那胖胖的、誠懇的女主人的面貌，至今還是很清楚地顯現在我的眼前。

那個女主人，她把為我留下的元旦早晨吃的煮年糕重新熱了一下，和已經冷透了的午飯一同端出來給我。我把這兩餐併作一餐吃下去，就一動也不動地接連睡了兩天。

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拘捕的經驗，對我來說，是一次有益的經驗。

由於這次的經驗，我學會了進入拘留所以後的應付辦法，明白了對警察的憎恨，更具有忍耐他們的“試煉”的信心。在我十八歲正月所發生這一事件，成了我以後參加革命運動後抵抗拘留所或監獄的訓練。

### 學法律的願望

1912年(大正元年)秋，我進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但是在那裏能夠安心求學的，只是在第一、第二學期。到第三學期，因有各種事情發生，學費接濟不上，僅僅讀了十個月，我就在1913年夏初中途退學。

在這短短期間，我有這樣一個印象：日本高等學校的目的就是只要讓學生把外國語學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感覺很無聊。

像前面所寫的，我原來是打算將來成為一個醫生而來到東京的，經過了補習學校時期，逐漸對政治、經濟、法律等感到興

趣。我時常到神田街的舊書肆踴躍，尋找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寫的東西來讀，而把投考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那裏，我還可以找到早年出版的“平民新聞”。“讀賣新聞”也在这時候發表了山路愛山的日本歷史。這時斯波貞吉也常寫文章。“萬朝報”時評欄上的黑岩溟香的文章，是我喜愛閱讀的一種。堺利彥、高島素之等人出版的“新社會”雜誌，是在這時以後二年左右的事；當時有一種名為“賣文社本”的刊物，其中載有進步的評論或隨筆，也是我在神田街書店裏常瀏覽的東西。

東京的街道壞得驚人，是我至今記憶猶新的當時事件之一。稍為落一點雨，到處都變成了泥濘不堪的路。只有銀座的一段是石砌的道路，其他地方連銀座的街道也是一樣，一降雨就到處變成了泥濘的路。因此，降雨時行人穿普通木屐是不頂用的。我經常總是腳上穿着高底的朴木屐，為尋找我所喜愛的報紙、雜誌及舊書而在神田街頭徘徊。這樣，我在不知不覺之間便有意地放棄學醫而改習法律了。

### 鹿兒島舅父之家

我因想學法律而選定投考第七高等學校，有下列的兩點理由：

第一是，當時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資本主義急遽發展，接着，律師在社會上的勢力便強大起來。而且，作律師是沒有錢也能够辦到的。即使我在第七高等學校不能順利地讀下去，只要打下基礎，我用自學方式來鑽研法律，作律師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別是我知道，木下尚江是律師而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這給予我很大的影響。社會主義的種子已在我的心裏長出難以泯滅的萌芽。

另一理由是，當時我感到只靠在沖繩的母親寄來的錢，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在學校繼續讀下去。若到鹿兒島去，那裏住着我母親的異母弟，他擁有很多資產。萬一有什麼困難，還有些親

戚、朋友可以幫助。寄人籬下的滋味，我從在那霸的中學時期已經深深的親身體會過；但是在今後不能更多地仰賴於貧窮的母親的情況下，那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因此，為了期望能夠得到鹿兒島舅父經濟上的援助，我選定了第七高等學校。聽說這位舅父為人善良，所以當我想到在那霸的外祖母處所受的冷酷待遇時，我認為總不會比這再壞。但到後來一看，這種估計是完全錯誤了。

入學考試在七月舉行。我在五月初就從東京動身赴鹿兒島。因為窮得可憐，身邊的東西除了被褥和書籍以外都賣掉了，這才好容易湊足了到鹿兒島去的三元五角的火車票錢。買不起一雙木屐，我只好穿著草鞋去；可是從鹿兒島車站剛剛下車，偏偏運氣不好，下起雨來，走不一會兒，草鞋便完全濕透了。我還記得那時沒有辦法，只好在路上脫掉草鞋，光著腳走到了舅父的家。那樣子，就連我自己也覺得萬分狼狽。

舅父的家，位於鹿兒島的市街後面山崗的中部，是一所在西鄉寺的廂宇的墓地背後好像西洋式別墅似的房子，從那裏可以一眼看到櫻島和鹿兒島整個的市街。西鄉寺裏有我祖先的墳墓。前年（1948年）我到一別三十五年的鹿兒島去，住在與這個山崗及岩崎谷（西鄉隆盛死去的地方）毗鄰的山中的一位同志家裏。舅父的家已經沒有了，在原来的地方蓋起了一所很大的遊覽旅館。據說那裏在戰爭期中曾被用作陸軍高級軍官的集會場所。

在舅父家裏，只有最初兩天我是受著客人的待遇，到的那天和第二天，他們讓我睡在樓上，可是在第三天他們就給我一條舊毛毯，把我趕到僕役們住的房中去了。這是由於兩位年輕的舅母以“琉球人太髒”為理由向舅父極力抗議所致。事實上，從東京來只隨身穿著一套衣服，而且還是光著腳來的，說是髒，當然是够髒的。但是在這家裏有漂亮的浴室，柏木做的澡池，同時可容三個人洗。我進入浴室，年輕的舅母來了，當著我的面，嘩的

一声把熱水全部放出去了，这使我非常生气，我从此以後，就沒有再走進那个浴室。於是我日常便到距有三町<sup>①</sup>远的位於岩崎谷口的澡堂去洗澡。这是一个用水蒸气通入石砌浴池的土耳其式的澡堂。

舅父並不想讓我白吃飯，所以叫我給他飼养小雞。舅父养了一百五十多隻雞，做着半營業式的养雞買賣，养的雞以白色的萊亨雞为主，也雜有黑色的西班牙种。記得其中有食蛋用的雞兩種，蛋、肉兼用的一种。雞蛋每日約生七、八十個。撿雞蛋、拌飼料、割青草以及到魚市去取魚的臟腑回來，把它煮好、切好、拌到麩皮裏去餵，这些都是我的工作。最後連孵雞也得由我來照料。總之，我在这裏又受到了和在那霸舅父家同样的待遇。不，簡直比那霸時還要坏，在那霸並沒有叫我同男女僕人住在一起。但是，還有比这个更使我感到难堪的是，在鹿兒島所受到的对琉球人侮蔑的特別待遇。这在鍛鍊我青春的活力和培养革命的勇气与信心的意义上，是起过很大的作用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在七月投考了第七高等學校。在四十二名錄取者中，我是第八名。可是到九月學校要開學時，舅父却拒絕我住在他家中去上學。理由是：上了學便不能再飼养小雞了，只住在家裏吃閒飯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所以說，我從進高等學校那一天起，就受到了重大的經濟的打擊。

### 日本資本主義的青年期

日俄戰爭對日本資本主義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素。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也非常注意這一點。列寧把日俄戰爭視為“在世界史上新時代的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大家所熟悉的。這個戰爭又成為1905年俄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向國際間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敗、墮落及其脆弱性。的確，此外它還給東方的各

<sup>①</sup> 一町約合109公尺。——譯者

民族以重大的刺激，從此以後，中國的國民黨及印度的國大黨的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我从东京的補習学校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的時候，虽然离日俄战争的結束已經有七、八年，但是战後的繁荣还繼續着，並沒有完全冷落下去。不过經濟的發展已顯出停滯，繁荣也逐漸趨向衰退。

在政治方面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从日俄战争前到这时为止的十年中，日本政府是由桂太郎与西園寺公望二人輪流主持組閣的。第一次桂內閣造成了四年七个月的長寿紀錄，第二次內閣也延續了三年一个月，可是第三次僅僅 53 天便垮台了。在这中間，夾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西園寺內閣。這兩個人的時代（1901—1912 年）是日本官僚政治達於頂點、最为興盛的時代。西園寺是政友會的總裁，但当第一次內閣組閣時，完全違背了人民的期望，幾乎完全用官僚勢力來把持政府。在閣僚裏，政黨人士只有原敬和松田正久二人。在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政黨人士也只在这二人之外加了長谷場純孝一個人。不过，如果更仔細地加以觀察的話，人們可以看出，从這時候起，已開始呈現軍閥、官僚的影子表面上逐漸从政治舞台消退的跡象。因此，在後繼的第三次桂內閣以 53 天这样短促的時間而垮台時，已達到最高峰的軍閥和官僚勢力被迫走上了衰微的道路。我放棄學醫，抱着作律師的決心離開东京，就是在这以後三個多月的事。

在世界情勢方面，德國軍國主義日漸抬頭，這成了英國、法國的重大威脅。德國商品充斥世界市場，在日本也開始認為凡是好的東西總是德國貨。在學術方面，不用說德國法律和經濟，甚至就是德國自然科學，都在日本風靡一時。

当第二次桂內閣一手捏造的所謂“大逆事件”<sup>①</sup>發生的時

① 指日本政府於 1910 年以“計劃暗殺天皇”的罪名，捕殺幸德秋水等無政府主義者的事件。——譯者



候，我還在沖繩的中學讀書。那時，因為我已讀了中江兆民和幸德秋水的著作，軍閥官僚的桂內閣這一殘暴的鎮壓事件，給了我強烈的印象。在日俄戰後瘋狂般的歌頌軍國主義聲中，我對於這一事件特別感到憤慨的原因，是和下述的事有關的。

中日的甲午戰爭爆發時，在沖繩有中國派，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有相當大的力量。這一派是以所謂“三十六氏”的中國移民為骨幹的。從前他們聚居在那霸的久米村等地，後來這個集團逐漸瓦解了。他們在過去曾經是琉球尚王在政治、經濟、貿易以及船舶航運或氣象等方面的顧問。其中最著名的是程順則，他是一位氣象學家兼農學家。他的家在我的故鄉國頭郡的名護，他在明治以前一直擔任當地的地頭<sup>①</sup>，因此，他和我家一直有來往。明治以後，因廢藩置縣的變革，這些人失去了統治地位，被驅逐到鄉間的開墾地區去了。所以，他們對明治政府抱着反感，在他們影響下團結起來的人民，掀起了一個小型的、地方性的反日本運動。中日甲午戰爭時，沖繩的所謂中國派就是這批人，因為我的家和這中國派有很深的關係，我在幼小的時候，就在不知不覺間受到了這個運動的某些感化。日俄戰爭發生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在我童年的回憶中還記得，每天捷報頻傳，像過節日似地喧嚷着，而每次他們總藉口來勒索金錢，這在我的童心中惹起了深深的反感。這一點，我想可能就是形成我以後進中學時立即使我接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文學家的因素，更是把我引向中江兆民和幸德秋水的動機之一。

我對戰爭的本質雖然還不大了解，但從這時候起，在自己的心裏已引起對戰爭的憎恨。

日俄戰後股票投機業顯得異常繁榮，這也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到東京的時候，到處都在談着股票，暴發起來的股票經紀人到

---

<sup>①</sup> 地頭是由莊園主任任命的管理土地的官吏。——譯者

处为所欲为，他們逐漸開始過問政治問題。其中以被称为“天下的絲平”的以及福澤桃介等最为著名。有一个叫“鈴久”的股票經紀人在宴席上聚集了幾十个妓女大鬧一陣，最後在盛生魚片的菜碟上每碟放上一枚金幣，送給每个妓女，这种近似瘋狂的舉動使世人大为驚訝。因为这种情况，妓院也非常兴隆，与当时正在盛行的賣明信片畫片的行業結合起來，妓女的明信片像今天的演員照片似的，氾濫於東京街頭。叫做“万龍”的是天字第一号的美女，其他如“英龍”、“老松”等也都負有盛名。那時，各地还流行着选举“花國美人”等的舉動。

在文学方面，正是以田山花袋、島崎藤村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抬头的時代。但在另一方面由自然主义轉向唯美主义的永井荷風也很受人欢迎。新聞方面，“新聞講談”大佔势力，一時压倒了“新聞小說”。但是森田草平的著作“煤烟”也是在此時產生的，是和以夏目漱石为核心的森田草平、鈴木三重吉等帝大派相媲美，坪内逍遙、島村抱月的早稻田文学派也非常活躍。帝國劇場成立，日本開始有女演員登場，也是在这時候。森律子、村田嘉久子、河村喜久江等人是最初的一批。日本古典劇歌舞伎也很兴盛。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劇場与文藝协会這兩個新劇運動組織也是在这時(1911年)成立的。我記得我曾傾囊到帝國劇場去看过自由劇場演出的“夜店”(高尔基原作)。从此西洋劇才開始与日本人相接觸。不过在演劇方面，當時仍然是新派集其大成而達到登峰造極的時期。从唱流行小調的川上音次郎以至藤澤淺次郎、河合武雄、伊井蓉峰、喜多村綠郎、井上正夫等優秀的演員，都不断地在本鄉座、新富座、明治座以及帝國劇場進行演出。

同時，日本的紡織業也和其他先進國並駕齊驅，逐漸開始侵入了远东市場。日本的棉製品已開始在國際貿易舞台上抬头。米價从每日石十三、四元一籮而为十八元左右，人民的抗議，和这昂貴的米價一同開始高漲起來。“友愛會”的成立是在1912

年（大正元年）八月一日。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不过，我却在这一年到鹿儿岛去，隔了一年又不得不从那里再一次回到冲绳岛，对中央的这种新动向，暂时也就疏远了。

总的说来，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资本主义已逐渐成熟起来。它由少年期而步入青年期，并踏上了国际舞台，开始要求新的席位了。

### 第七高等学校时期

第七高等学校是由原来旧藩时代的学校“造士馆”所改成的。其他的高等学校，如第一高等学校设在东京、第二高等学校设在仙台、第三高等学校设在京都、一直到第六高等学校都设在全国各地区的中心，惟有第七高等学校与众不同，虽然在邻县的熊本设有第五高等学校，但它又在鹿儿岛特别设立起来。这样反把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排在后面。这是由于萨摩官僚在中央的势力浩大的缘故，同时也证明了官僚是怎样横行霸道。因而，第七高等学校的校风，和其他高等学校相比较，就显得有些古老的地方；因为这是勉强设立的，内容也就不够充实。

在我入学时，岩崎当第七高等学校校长，他是学校开办时就在那里的，但他除了是个基督教徒和人品好以外，简直一无可取。这位岩崎校长因自己所照顾的一个学生和女人发生了醜事，引咎辞职。后任校长小西重直是一个年在四十左右的新进学者，新从外国回来。他曾在德国研究教育学，和岩崎校长相比，就显得时髦和进步得多。他以后担任过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不过，这第七高等学校的其余的教师们，都是“造士馆”式的老先生，带有新风气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日本高等学校一般都是设有学生宿舍的；第七高等学校的宿舍因地方较小，原则上只能容纳一年级生和少数二、三年级的负有领导责任的学生。至于学校的图书馆最为可怜。在高等学校或大学里，图书馆如果太空虚的话，那就毫无意义。因此，

在第七高等学校，利用圖書館的学生实在是太少了。

学生中，以鹿兒島当地人为最多；其次是东京人，但其中多數还是在东京当軍人和官吏的鹿兒島人的子弟；也有从九州各地及四國來的学生，最有趣的是熊本人却幾乎一个人也沒有。自从德川幕府把細川家封於熊本使与島津家相抗衡的舊藩時代以來，这种半敌对的对抗意識長期存在着。鹿兒島人也不到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去讀書。事情似乎是可笑的，但是應該說，封建思想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却是存在着。在第七高等学校內部，鹿兒島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們的对抗意識也很濃厚，時常發生衝突。我从舅父家中出來搬進宿舍後，就参加了东京帮；有一次，我同这些夥伴一同到街上喝酒，在回宿舍時，正和剛練習完日本拳術回來的鹿兒島帮面对面相遇。学校大門的外面便是護城河，在河上面架設着一座桥。对方是十个人，这方面是三个人，正在桥的中間相遇。十个人並排地站滿了狹窄的桥上，聳着肩膀拥過來。要走过去，無論如何就必須突破这个陣圍。对方既然是來勢洶洶，这方面也是三盃入肚，因此大有与其臨陣脫逃不如战死为上之概；向前還沒靠攏兩、三步，立即演成了一場兇鬥。十个人和三个人搏鬥，無論如何对我这方面是不利的。自己方面的其他二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只剩我一个人被敌人团团圍住。心裏虽然想对方是会日本拳術的，讓他們捉住可不得了，但到底被他們按住了手脚，扔到了護城河裏。河水有三、四尺深，底下是泥濘，所以我並沒有受什麼重伤，不过从河裏爬起，回到宿舍自己房中，不得不躺下一連休息了三、四天。同室中有从鹿兒島鄉間來的相处較好的同学，担心这事，从中說和，因此，这次爭吵也就算完了。

学校中有一位从倫敦回來的姓松本的英語教師，他對於發音非常注意而對於文章的講解能力則十分不够。但是，他總是以內行出身自負，态度傲慢，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惹起了全体学生的反感。據說，他在倫敦和一个英國女人結婚，回國以後，他

的夫人因为他的無能而丢开了他，另在东京居住。像他这样的人，惹起学生的反感，也许是当然的。有一天，我在教室裏对于他的讲解的不清楚和他那种傲慢的态度提出了抗議。他却回答说：“一个琉球人，还说什麼狂話！”于是我憤慨地向大家控訴說：“像这样侮辱学生的教師，沒有資格当教師。應該立刻驅逐出校！”我的抗議正是發洩了全体学生的不滿情緒，所以大家立即表示贊同，最後決定罷課。可是其中也有五、六个人頑强反对，因而發生了糾紛。这些傢伙多半是鹿兒島人，平日成績不及格或成績不好，害怕因此受到学校方面的注意，自己有被開除的危險；由於这种自私心，他們反对罷課。我們不顧这些傢伙的反对，決定罷課，接連兩次沒有去上英語課。

就在第七高等學校的時候，柏格森的哲学已被介紹進來了。在那時候以前，安倍能成所譯倭鏗的“七大哲人”是我們所最愛讀的。在东京幫中有位名叫內藤吉之助的同学，他後來在京城大學教授法制史，在東京大學任助教時期曾譯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當時在我的一班裏表現了極大的求知傾向而不為學校功課所牽制的，就是這個內藤。因為我也一向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兩個人意氣頗為相投。柏格森的哲学也是我从內藤那裏借來讀的。我對於倭鏗的東西感到太陳舊保守、缺乏發展性，讀了柏格森哲学，對於它的富於創造性的地方，彷彿有了新鮮空氣吹進來的感覺。當時我還沒有批判柏格森的能力，也沒有批判地理解柏格森的能力，只是對那種新鮮的事物感到一種魅力。柏格森的哲学，作為資產階級哲学，已有長時期的歷史，並且也就是資產階級哲学中最後的一種。只憑坐在書齋中的思考而產生的資產階級哲学的見解當然是不會超過它的。這種哲学表現了這樣的一種情況：自己雖然也感到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因為自己無法解決它，又不斷地感到很大的苦悶。因此，柏格森哲学的影響在某些方面是有利於納粹的。

## 重返冲繩島

在第七高等學校的時期，那裏還沒有什麼學生運動。就是發生一些政治論爭也多半是全盤搬用大學教授們的論調，如果談到社會主義或工人政黨的必要性的言論，那就會被視為異端邪說。多數的學生在學校裏只知用功學習學校的課程，熱中於學校成績的提高。當時正在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青年們都捲入了激烈的軍國主義的風潮裏面。從當地的情況來說，鹿兒島是這種風氣特別濃厚的地方。不管哪一個中學，都成了士兵學校與軍官學校的預備學校的狀態；考入士兵學校或軍官學校的人數較多的中學，就感到洋洋得意。古代封建教育的遺風和軍國主義相結合的學風，是到處可以見到的。鹿兒島的每個街鎮，都有所謂“健兒社”的青年組織，這是訓練封建的忠孝思想和武士氣質的地方。十二月，鹿兒島舉行紀念赤穗義士的“義士節”。到了三月，還有“伊集院參拜”，早晨穿着鎧甲到祭祀着舊藩主島津家的中興之祖的伊集院神社去參拜。以“健兒社”為中心，盛行着所謂祭童的不自然的風氣：青年人在冬天也不穿襪子，穿着窄袖的短衣服，剃個和尚頭，手中揮着粗大的手杖，聳着肩大搖大擺地走着，他們以這種粗野成風而不修邊幅為驕傲。因此拳術、劍術極為盛行。這種風氣當然也侵入到第七高等學校中來，激起了我的反感。不過，在鹿兒島人之中，外表剛強而內心柔弱的人卻佔着多數。

我在第二學期以前反正總算維持過去了，到了第三學期，在把夏衣換為冬衣的時候，終因學費供應不上，便從第七高等學校退學；退學時，還欠下朋友的錢，差不多像逃跑似地回到了故鄉冲繩。

在冲繩的自己的家，也是債台高築，已瀕於破產的前夕。因為在家中販賣雜貨無法生活，我就到離我的出生地名護約有五公里遠的安和小學校當代課教員，在那裏工作了半年以後又轉

到國頭郡郡公所當職員。

### “貧乏物語”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從日俄戰後一直走着下坡路的日本經濟界又呈現了新的繁榮氣象。這種氣象也波及到沖繩的鄉間，使我感到長此在沖繩住下去是不会有出路的。

我第二次到東京是在1917年(大正6年)的二月上旬，春天已經來臨了，但寒風還吹得正有勁。離開這時還不過一個月左右，三月十二日(俄曆二月二十七日)俄國的彼得堡發生了“二月革命”。在這前一年的九月，河上肇博士的第一部著作“貧乏物語”(貧窮漫談)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續發表。我把它視同珍寶似地從報紙上剪下來讀。比這稍早一些時候，在美國還出版了一些以“馬克思主義批判”形式出現的、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書籍，這些書在日本也出現了譯本。儘管這還不能正確地稱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這些譯本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進入日本以前，在日本國內培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嚮往情緒。河上博士的“貧乏物語”就是在那種空氣中寫出來的。據說發表這篇文章的“朝日新聞”銷路非常好；我想事實上也一定是如此的。

我在故鄉國頭郡郡公所當職員的時候，同事中有一位我以“大哥”相稱的先期畢業的同學。他的名字叫做安次富松藏，我在那霸中學一年級時，他是五年級學生。因為同鄉的關係，在中學同學雖然才不過一年，但他卻很喜歡我。安次富在那霸中學畢業後，就升入今日已改名北海道大學的札幌農科大學。他的家在村子裏可算是中等以上的農家，不過為升入高級學校所需的學費仍然還沒有，所以他是領取郡的獎學金才畢了業。凡是領取這獎學金的學生，在學校裏所研究的學科，必須受到指定，而且畢業後還必須回到本郡工作。因此，安次富在札幌農科大學學習農政學，畢業後竟作了郡公所的農業技術員(雖然研究農政學而當技術員有些可笑)。於是，我和他從中學分手以後又相遇，

並且能從他那裏得到一些新知識。恰巧，這位安次富對於馬克思主義是很有興趣的。

研究農政學的人而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例子，在日本是很多的。現在，如山田勝次郎就是如此，東京大學的近藤康男教授等人也可以算在內。過去，如豬俣津南雄、佐野學等人也是屬於這種情況的，退一步說，那時至少有很多人是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與農業有關的一些人中早就有很多這樣的人，在日本農林省中甚至在今天這種傾向還很顯著，這並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即使學會了農政，在日本也幾乎無法施展。為了想從這裏找到一條出路向前發展，也就是說，為了使日本農業資本主義化，以日本這種狹窄的土地與農業的形態來說，只要向前發展一步，最後就要走向馬克思主義。

由於這種關係，我們的安次富技術員也是一面擔任郡的農業計劃和經營的指導，一面逐漸對馬克思主義感到興趣，閱讀從美國介紹進來的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他還讓我讀這些書。從中學五年級讀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真髓”時起，到經東京、鹿兒島返回故鄉時的五年多的期間，我那一直保留在年輕的心靈裏的社會主義的種子，現在遇到了安次富松藏這位指導者就蓬勃地長出芽、結出果實來了。因為有了基礎，這個種子成長得很快，不久後我對安次富借給我的書籍感到不滿足了。正在這時“貧乏物語”出版了，這使我感到了極大的興趣。這本書雖然和馬克思主義間還有相當的距離，可是在進一步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的意義上來說，在當時對我是最適合不過的。我讀了“貧乏物語”以後，覺得不能在沖繩再呆下去，無論如何必須到東京去。

當時沖繩縣知事大味久五郎是個既傲慢又粗野的人。這位大味知事曾帶許多嚶囉，前呼後擁，有如古時諸侯出巡似地到各個郡去視察。那時候，我也是被任命為隨員之一，我親眼看到這位知事的諸侯出巡式視察的惡劣作風，感到非常憤慨。緊接着，



为了在知事巡查以後作進一步具体的視察，冲繩縣政府的地方科長里見哲次郎也來到了我的郡。我和这位剛过三十歲的年輕的地方科長一道巡視各村。在巡視期中，有一天，我無意中和他談到我希望往东京去的志願。里見後來當上了長野縣的學務處長，然後退職。當時我向他談起我無論如何想到东京去的事，我說：“不過，就是到东京去，因為沒有學費，我也必須半工半讀。”他听了，一口應承說：“好，我來幫助你。”他說，在遞信省的东京儲金局中有他的一位同鄉前輩，他可以把我介紹給那個人。他所說的同鄉前輩，記得好像是儲金局的管理局長，總之是一個能夠隨時錄用一兩個僱員的人。於是，我向郡公所辭了職，那時自己稍有積蓄，再加上多領一個月工資作退職金，湊足了二十四、五日元的旅費。我又到一別五年的东京，到东京後，靠着里見的力量，充當了东京儲金局的僱員。

起初，每天的工資是五角一分錢。因為我是中學畢業生，作為僱員的工資來說，這還是比一般的好。不過，這五角一分錢的一分錢是有些可笑的。但是仔細一想，每天一分錢，一個月也是三角錢，在那個時期來說並不能過分輕視。

儲金局的工作，有計算款項和整理賬簿兩種。我被派從事後一種工作；或是整理新存款戶與清賬戶的總賬，或是寫發信出去的收信人的住址，或是把存摺裝在袋子裏拿到二樓、三樓上去下來，這種工作真是無聊透頂，只是出賣勞力而已。我原本打算藉此半工半讀，開始作參加律師考試的準備，然而，這種工作太乾燥無味，不久後我就雄心勃勃地想找找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工作。從1917年的二月到十一月在儲金局工作期間，我曾於四月進入日本大學的夜校。日本大學在神田區的三崎街，我就在距學校較近的今川小路找了個公寓。從這裏到东京儲金局所在的築地來回坐電車需要九分，不過這九分對於每日工資僅五角一分而半工半讀的我來說，却是件大事，所以我經常拖着木屐從神田走到築地。從神田橫穿護城河邊，經過現在帝國飯店的

後面，由山下街出新橋而到築地，這一段路步行要一小時左右。在早晨八時就開始辦公的夏天，我必須在七時以前從公寓動身。

### 儲金局時期

日本的工人運動，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從片山潛同志等領導的時候起，曾經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從日俄戰爭前後到大正初年，一直陷入消沉時期。上面已經提到過，在這個時期中，1912年（大正元年八月）“友愛會”成立。作為後來“總同盟”的前身的友愛會的產生，表明從此時起工人運動又逐漸有了抬頭的跡象。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戰時繁榮的情況下，工會運動逐漸進展。以我進儲金局的時分，即1917年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那一年為分界，在這時以後，工人運動就加速它的步調而日趨高漲起來。

友愛會是一個受着基督教影響的組織，它是在澁谷榮一等人的支持下成立的，以鈴木文治為會長。這個組織，作為工會來說，是個十分原始的形式，從它僅僅特別強調工人間的“友愛”和“互助”來看，很可以看出它那基督教的性質。它到後來逐漸轉向和資本家鬥爭，在當時也已經向這個方向顯著地露出了萌芽。

另一方面，正在這前後（1916—1917年），歐文印刷工人工會的“信友會”組成了。信友會是1907年（明治40年）成立的“歐友會”轉變而成的。歐友會在反動時期的艱苦年代好容易掙扎過來，到世界大戰發生，歐文印刷減少，受到了重大的打擊，這次在工會運動的進展時期，它又重整旗鼓以信友會的名義而復活了。並且在第二年（1918年），信友會已不限於歐文方面，更擴大範圍到日文印刷工人中間。起初這也是一個穩健的工會，吉野作造、安部磯雄、堀江歸一等都與此有關，它特別是受到大杉榮等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很大。它也受到堺利彥、山川均的影響，但和無政府主義者比較起來，這個影響是薄弱的。在印刷工人工會中，這種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一直繼續存在到很久以後。

战敗後，“讀賣新聞社”發生工潮的時候，爭議因中的綿引、布留川等人就是來自那個時代的人物。

这样，日本的工人運動正在蒸蒸日上的時期，在遞信省內部也模糊地產生了對工會的憧憬。我也對工人運動關心起來，和二、三友人在儲金局開始了宣傳運動。但是為了和這驚人的工會運動相對抗，這時遞信省內部已經成立了一個惡劣組織，這就是“共濟會”。掌握共濟會實權的是高級官吏。共濟會的工作，每月收取五、六角錢的會費，每年舉行兩次對長年工作者和不缺勤的人的表揚。這些事情本來是政府應作的，並不屬於共濟會的工作範圍之內。遇到會員生病的時候，按照規定，共濟會應當拿出錢來，但是他們却藉種種口實，不肯出錢。結果，只是因為聽說離開儲金局時，已繳的會費能夠退回，所以大家懷着這種希望把繳納會費當作儲蓄。不過因胡鬧或肇事而被免職時，此項應退回的會費是領不到的。這一點，使大家都存有戒心，就像貓一般的馴服。共濟會就用這種毒辣的方法來壓制一般職工參加工會。六、七月當我在那裏時，共濟會舉行了一次表揚，我班裏的那位像傻瓜似的除了寫字以外一無所長的班長受到了表揚。我認為這有些過分糊塗可笑，曾向同事們呼籲反對表揚，但反響是很微弱的。我所以不滿一年就從儲金局辭職了，對於這些事情感到憤慨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實在說來，對於當時的同事們，這樣的共濟會也是具有誘惑力的。那時在儲金局裏工作的大多數小職員，並不是以工作為目的，而是以學習些什麼為目的。因為是為了求學而勞動，工資就是低些也忍耐着。十四、五歲開始工作，大家甘願忍受低廉的工資，同時都去上夜校讀書。不過這也是徒然的希望。儘管說以求學為目的，實際上，還是在從事勞動。在被剝削的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在儲金局有許多青年婦女，本質上和紡織廠的女工是完全一樣的。她們一面受着嚴重的剝削，眼看自己心中描繪的那些夢一般的未來的遠景像浮雲似地逐漸幻滅了。一生一度的重要的青春，就這樣被消

磨掉。工人應該認清自己是工人。因為沒有這種認識，他們不管到什麼時候也不能不繼續做這種糊塗夢。由赤松克磨等人在遞信省內組成一種工賊工會組織“遞友會”，還是這以後很久的事。

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剛巧在我進入遞信省後不久和我辭職前不久發生的。這兩次大革命在我們中間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二月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報道方面，首先是克倫斯基登場。列寧的名字還是經過一個時期以後才傳來的。俄國革命給予日本工人的影響，有不可估計的重大意義。早自1905年（明治38年）第一次革命時期，在日本說是從幸德秋水時代起，人們一提到革命就想起俄國，任何一個革命家都談論俄國革命。甚至在用第一高等學校校歌——“玉杯之歌”的調子唱着的“革命歌”中，也有這樣的辭句：

“我們俄國的工人弟兄，  
正在高聲地呼喊：  
我們如果沒有自由，  
不如選擇墳墓。”

在日本進步的工人中間，對俄國革命的憧憬很早就是這樣親切的。因此，“二月革命”給予了日本的工人、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人以巨大的衝動。它給日本革命的民主運動自然帶來了巨大的刺激。接着於十一月七日發生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更進一步地促進這個民主運動，這已是不待再加說明的了。

我在築地的東京儲金局，聽到這“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消息時，對於當局用共濟會那樣組織來壓制工人革命的發展的行動，激起更大的反感，因而決心要離開儲金局。我打算在從律師走向社會主義運動的路綫上更進一步地向前邁進。

### 充當律師的書僮

我從書本上所讀到的或者從人們的談論中間所聽到的，認

为書僮这个工作對於半工半讀是適宜的。就主觀地以为用得起書僮的人在這一點上一定是好說話的。所以離開遞信省不久，就在九段下設有事務所的小野律師那裏充当書僮。但是当了書僮以後立刻就發覺自己的想法是錯誤了。所謂書僮，顧名思義，完全是一个守門的。在房門旁兩塊蓆子大的狹小的房間，放上一張桌子，桌子旁邊就是我睡覺的地方。我進進出出地接待來客，接听電話，的確和看門的沒有什麼兩樣。此外，我還不得不做着燒浴水和打扫房屋等雜務，忙的時候連晚上上學的時間都被耽誤了。只有讓我抄寫訴訟文件這一件事，總算還有些好處。可是到月底付給的工資僅僅才五元錢，這不能不令人驚訝。不論怎樣管吃管住，這點錢是維持不下去的，所以一過新年才一個半月我就從那裏跑出來，又回到神田今川小路原先住過的公寓，尋找新的工作，不過也總不容易找到，從那時以後，我接連有三個月一直沒有職業。

這一年——1918年(大正7年)，正是我一面和不安定的生活鬥爭，一面艱苦學習的時期。那時我是二十五歲。在這一年前後之間，我從作法院的寫字員起，輾轉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抄寫工作。在法院的地下室中，把記錄員寫的不易辨清的字用鐵筆寫在謄寫版的蠟紙上。起初寫得不太好，經過一年左右，也就逐漸寫得好了。現在我的手指上還留着那時的紀念。在中指尖的側面，因執鐵筆磨起了一個又硬又大的雞眼，甚至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它仍然存留着還沒有消滅。旁邊的食指歪扭成為三角形，也說明這種艱苦奮鬥的痕跡。法院的寫字員生活，作為律師考試的準備是有用的。不過，現在想來，當時我所做過的各種工作，包括這一工作在內，都是在連房租都付不起而被從公寓趕出的那樣艱苦的狀況下過生活的，因此都成為極好的體驗和鍛鍊。

從事抄寫工作有很忙的時候，但也有一點事沒有的日子。在這樣日子，我就做區公所的臨時僱員。這是有如臨時僱工似的。

有時充當區公所防疫人員，提着藥箱，跟在醫生和護士的後面各處奔走；有時則揹着傳染病的消毒器，一边走一邊嗖嗖地打着。做這種工作，在當時一天是一元錢。掏泥溝等工作則是五、六角錢，因為打消毒液是以傳染病為對象，有危險，所以報酬也比較高些。因為我是一面在求學，尽可能要做些輕而賺錢多的工作。不過事情並不盡如人意，有時我也常去掏泥溝。但是，在今川小路的公寓裏，住着一個在本所區公所當職員的人，他和我住的是樓上下，熟識得很，因此，我常能由於他的介紹而找到一些比別人較好的工作。這位區公所的職員的太太是個女理髮師，夫妻兩個人勞動，勉強餬口。當時一般生活的困難情況，由此可見。在學習法律之外，我從這樣實際的生活中，學得了種種寶貴的經驗。

但是，這種不安定的生活是不能長此下去的。我想無論如何總得想個辦法。正在此時，東京港在芝浦開港，排水量三千噸的船隻開始駛入，那裏正在招收船員。當時歐戰還沒有結束，地中海上也曾有日本輪船被德國潛水艇打沉，一般人都怕當水手。但是，水手的待遇卻很好，據說到歐洲航行一次，回來可以存起五十元左右。而且坐船還能看看歐洲。友愛會（總同盟）裏面，已經成立了海員部，海上工人的工會運動也逐漸活躍起來。我不禁躍躍欲試。內心以為暫時做一下水手也許能夠掙些學費出來，我就前往報名應試，受了體格檢查。但正在這個時候，有位老前輩說要介紹我到東京府公署去工作，求職心切的我，正在走投無路，也就同時懇請他為我謀事。這樣一來，這個府公署方面先決定了。我這才差一點沒有當上水手。

在東京府公署，我是地方科的小職員。我的工作監督各區、各郡的稅收。科長是剛從大學畢業、還未脫學生習氣的安井英二。在1940年（昭和15年）第二次近衛內閣時，這位安井英二科長曾以文部大臣入閣。那時，我在獄中聽到這個消息，心想憑他那個樣子也能當大臣嗎？當時的安井科長就是那樣一無所

長的一個人。我進了府公署以後，生活逐漸安定下來。不久後我的月薪加到三十五、六元，這對我說來是一件劃時期的事情。因為是在戰爭結束後經濟繁榮的時期，工資也以各種臨時戰爭津貼的形式增加起來。但是物價却更加猖獗地扶搖直上。從1918—1919年（大正7—8年），工人鬥爭漸趨激烈，繼“米騷動”之後，各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的勞資糾紛。日本的工會運動這一年顯示了巨大的進展。日本帝國主義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榨取人民的血汗，大形膨脹，而這時特別是勞動力不夠的時候。1920年（大正9年）股票暴跌以前，物價飛漲，甚至在股票猛跌以後，物價的漲風也未停止。因此，工人的罷工運動接連向全國擴展，很不容易減退。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我的職業安定下來了，比前更能夠安心讀書。

我那時是日本大學專門部法律系的学生。那時的日本大學，如果稱它為學校，那實在太過譽了。它的校風是：學生來上課也罷，不上課也罷，怎樣都可以，只要每月繳學費六元，一年考三次，把規定的學科在三年間修完，就可以從學校畢業。而且連考試的學科也可由學生隨己所好自由選擇。因此有許多學生不到校上課。我也只在最初的那一個月左右認真到校，以後就只選擇特別感到興趣的先生講課時才去聽課。因為我進日本大學專門部的原因是，只要能獲得考試律師的信心和資格就可以了。

何況，學校講義的內容大體上也都是枯燥無味的。鳩山秀夫的民法學是學校中最受人歡迎的。但一聽他的課，他也只是在唸他那已在法律雜誌上發表過的講義稿，只是為了讓學生抄筆記而慢條斯理地、一句一句分開地高聲唸着，簡直是一點意思都沒有。這樣真不如去讀刊在法律雜誌上的他的論文更要來得痛快些。因為鳩山秀夫的課尚且如此，而我又特別喜歡讀判例的批判，所以就在家中閱讀而不想再上學校去。至於山岡萬之助擔任的“刑法學”更是無聊，我只去聽了一次就不再去了。牧野英一當時還算是比較進步的，我對於他的法國學派的社会法

律学，很感兴趣。但是，計算一下我在日本大学听课的时间，也许实际上只有一个月左右。虽然这样，在这学校的三年期中，在繳学费的时候，我还是按时到校的。

在只知賺錢和徵收半强迫性捐款的“学店”中，日本大学可以算是最胡搞的一个了。校舍既不像样，教師也馬馬虎虎。它只是以工讀的苦学生为对象而成立的，因此，來上学的多數是窮学生，其中似乎以白天在鉄路上工作的人特別多。由於这是平沼騏一郎的根据地的關係，隨着他的名声的提高，这个学校也擴展起來，成立了医科、工科，它变成像个学校的样子还是在很久以後的事。但在我就讀的时期，日本大学簡直糟糕得很。現在該校校址所在的三崎街三丁目一番地，面積極廣，乃是因为它是明治初期的一个兵营舊址的緣故。在甲午战争之前，为了筹措增置兵团的經費，松方正义內閣把这块地方和丸之內的五万坪<sup>①</sup>土地一同賣給了三菱財閥。當時的賣價是五十萬元。價錢便宜到極點了，但在當時誰都認為昂貴異常，成为奇談。傳聞有人說，这是三菱發揮自我犧牲精神才買下的；也有人說，还是三菱了不起。还有这样一种傳說：曾經有人問三菱第二代的岩崎彌之助：“三菱買那麼塊荒地做什麼用？買了不也是沒有用处嗎？”岩崎回答說：“栽上竹子，养老虎吧！”这在以後成了一塊了不起的地方。虽然沒有养老虎，但是在三崎街附近修建了飯田桥車站，丸之內被設計成为出入东京的大門（东京車站設於丸之內）。地價立刻上漲，已不再是五十萬元能够買下了。由此也可以看到壟斷大資本家和政府的一般勾結情形。这就是神田區三崎街曾經有过的一段歷史。

## 米 騷 動

米騷動事件發生在我入东京府公署以前的1918年（大正7

<sup>①</sup> 每坪約等於3.3平方公尺。——譯者



年)八月。這時正是我从儲金局辭了職,从事抄寫或掏泥溝的工作,我的中指上起了雞眼的時候;正是工人運動還沒有上正軌,以工人為首的人們都因減低工資而感到恐慌的時候。當時物價不斷上漲,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一般在物價上漲中,總由股票和米價領先,這時也是一樣。

每石 24 元左右的米,突然上漲一倍以上,超過了 50 元。

“一元錢買不到二升米”,因此,掀起了這一場大暴動。

富山縣的一個漁村——滑川的主婦們燃起了米騷動的導火綫,決不是偶然的。一般管理家務的是主婦。特別是漁夫的妻子,在自己丈夫出外時,全盤掌握丈夫的收入,料理家中一切。生活的艱苦,使無時不在計算錢不夠用的妻子,比把掙來的錢全部交給她們的丈夫,首先有所反應。漁夫的妻子是這些女人中對這一方面情況最為清楚的。

神戶所發生的襲擊鈴木、小寺等處的放火事件,在米騷動中是最有名的。自此以後三星期左右期間,消息從各地傳來,鼓動了其他地方,於是擴展成為波及全國三府三十餘縣的日本人民的歷史性的暴動事件。在東京有名的是對神田的精米市場與深川的米倉的襲擊。羣眾在襲擊了神田精米市場之後,從須田街擁到萬世橋,走到廣瀨中佐的銅像附近時,軍隊已在那裏列陣以待。因為突破這裏,就可以直達皇宮及政府各官廳所在的丸之內,所以政府方面在這一帶佈置了防綫。那時,指揮官雖然下令“開槍!”但士兵們都只把槍口對着羣眾,而不放一槍。雙方正在對峙的時候,警察們坐着大卡車來了。警察們立刻揮起警棒,向羣眾襲來,隨手亂打一陣。羣眾們在棍棒之下像爬行似地走着,拋擲石頭對抗——除石頭外沒有其他東西,因此不久後就被警察們衝散了。在東京雖襲擊了精米市場,但它的程度也不過是破壞而已,並沒有放火等情形。

當時,就在現在“每日新聞社”的後面,有一條所謂“冒險家胡同”的小弄,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山崎今朝彌這些社會主

义者們經常在這裏集會。到這裏來的还有不少投機的野心家或冒險主義者們。因此一般人就稱之為“冒險家胡同”，這裏的人們實在也有些“冒險家”似的作風，米騷動時，他們拿着裝了大糞的罐頭擁進農林省，把大糞罐頭扔向農林大臣仲小路廉身上。這是社會主義者的逃兵們參加米騷動的一幕。在米騷動時被攆了大糞罐頭的農林大臣，以後就永遠再也沒有在政界出現。

不，不只是農林大臣。在這次米騷動中，用宣佈戒嚴令來對抗的寺內內閣也被羣眾的力量打倒了。這個寺內內閣是日本最後的一個軍閥官僚內閣。以後復活的另當別論，這是日本的軍閥官僚政治被擊潰的時候。寺內內閣垮台後，接着出現了原敬政党内閣。米騷動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在促使日本人民羣眾覺醒和使日本統治階級感到恐懼上，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第二年，即1919年（大正8年）我在二十七歲時成為律師。我雖然是日本大學的學生，但可以說，差不多全部是自學。

我的政治活動開始了。以堺利彥、山川均等人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同盟”，也是在這第二年產生的。

Vertical li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 二、獄中十八年

## 二、獄中十八年

Vertical li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 富有正义感的少年

我於1894年(明治27年)出生在冲繩縣國頭郡名護村。我之所以成为共產主义者,有着特殊的原因。我的祖父是在鹿兒島从舊藩時代的船夫逐漸發跡成为船行老闆的。他把船駛到琉球,用非常便宜的價錢採購各种外國商品,运往鹿兒島、門司及大阪去販賣。从事这种船行生意的人,都在琉球娶个女人。我的父親就是这样的鹿兒島人和他的妾——琉球女人所生的。我的母親也是这样船行老闆和他的琉球女人所生的。我的祖母是非常貧窮的農家女兒,她出生的老家,房舍簡陋,好像豬窩一样。祖母生在这种地方,被出賣充当妓女,不久後便做了我祖父的妾,生了我的父親。母親也是出生在同样情形之下。外祖母出身於貧窮的工人家庭,家中有姊妹三人,有兩人被賣充妓女。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生長在这种悲慘的家庭裏。她們的家中沒有錢納稅,也沒有东西可賣,最後不得不把自己親生的女兒——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出賣。那時是慶应年間,据說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身價普通不过日本錢二十元左右,甚至只消十元左右就有出賣的。就是在我年輕的時候,这些女孩子的身價,也不过三十元到五十元左右。

我的外祖母在我幼年時代一边經營高利貸,一边買賣藍靛染料。所謂高利貸就是放印子錢,放債給窮人,一股五元錢,每月取息十分之一,讓窮人每天償还五分錢,一百天償清。与此同时,外祖母还販賣着染薩摩花布及久留米花布用的藍靛染料。这种藍靛从琉球运到九州是要失掉分量的,外祖母以此为藉口,

欺騙農民，賤買貴賣。

我从十三歲時起就从事計算这种失掉分量的騙人賬目。因为我家貧窮，在中学畢業以前我一直在外祖母家中做一切家庭雜務，要寫，要算，並兼討賬，同時還要上学讀書。因此一个月中到学校去的，平均只有二十天左右。我是在十三歲進中学。从这年輕的時候起，經營高利貸的人这样用欺騙方法來剝削農民和工人、剝削窮人的过程，就已經深深印入我的腦海裏。因此，对工人和農民的同情，和对那些从事卑鄙勾当的人——包括自己外祖母在內——的憎恨，日益在我的心中增長起來。我時常对那些向外祖母借錢的人說外祖母的坏話。我帶着笑談的口吻但很認真地对他們說：“从这种高利貸者的手中借錢是要不得的。到最後一定要被剝削得一乾二淨，这个錢絕對借不得！等到將來我賺錢時幫助你們。”

我曾經是一个熱心的富有正义感的少年。所以外祖母非常恨我，在中学時也不買皮鞋給我，在上体操的時間我只好借舅父的舊皮鞋穿，皮鞋寬大得很，穿起來会囊囊的响，兩脚却被磨出皮伤和水泡來，感到很受罪。但是外祖母对此却熟視無睹，漠不關心。平時沒有办法，我只好光着脚上学。到实在万不得已的時候，我就穿着家中的草鞋或木屐，这样一來，一定要受到外祖母的申斥。由於生長在这样的环境裏，我對於压迫和欺騙窮人的行为，抱有強烈的反感。我痛切地感到，在这种社会裏，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真正正直和幸福地生活下去的。

但是，不久後我有了政治覺醒，在憤懣的黑暗中射進來了光輝。直接推動这个覺醒的，是中江兆民的“一年半”。當時在外祖母家中住着一个名叫金城時男的十分進步的人。他是学校教師出身，當時任縣議會議員。我十五歲時，他拿“一年半”來讓我讀。這本書激烈地批評明治政府的橫逆無道，嚴厲地抨擊伊藤及山縣一派的腐敗無能，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動。在我十七歲時，也是他，讓我讀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真髓”。从这本用大字寫



着“馬克思曰”、“恩格斯曰”的書裏，我初次知道了社会主义。

### 以孝順出名

我在童年時是非常孝順父母的，據說現在村中還稱我為孝子。我的孝順特別集中在對母親和祖母方面，對外祖母正如前面所說，無寧說是具有憎恨之感。

我的母親，為了和父親結婚，鬧得和外祖母站在對立的地位。這是因為父親的性情，很喜歡喝酒，不懂得積蓄金錢，對人有求必應，不合外祖母的心意。為着這種緣故，父親經常陷於窮苦狀態，所以外祖母非常恨我的母親，似乎曾經幾次企圖使我的父母離婚，但始終沒有實現。因此，我，由於對外祖母的憎恨，結果格外加深了對母親的愛。我的故鄉，道路很壞，河上也沒有橋，有的地方行人必須涉水而渡，我時常揹着母親渡過這樣地方。揹母親這種事情，一般人是肯不肯做的，所以大家都說我是個十分孝順的人，實際說來我對母親的愛是很深的。

次於母親的，妹妹也是我幼年時代的愛的對象。我的後腦部到現在還有傷痕，這就是我在七歲時，因給妹妹摘花掉到河邊多砂石的地方而受的傷。石頭深深地陷進頭殼裏，必須拔出來，我痛得不得了。但是鹿兒島人是斯巴達式的，哭泣就會受到叱責，所以我並沒有哭泣，獨自一人到醫生那裏去治療。我在十二歲時又折過腰。那時因爬到榕樹上，從樹上逗着妹妹玩，不慎失足倒栽下來。從此以後，直到現在，我的腰部還感到有些不舒服。

我的祖母雖然也出生於非常貧窮的農家，但是和我的外祖母却完全不同，是個寡慾的、愚鈍的、溫柔的人。我的父親是祖母晚年所生的孩子，所以特別受到祖母的寵愛。我出生後，這種愛就集中在我的身上；我處在貧窮的境況中，但很受到祖母的溺愛。祖母喜歡烹飪，為了尋找做菜的材料，當她去拔草或捉田雞及河魚時總是帶着我一同去。我也非常愛祖母，比家中的任何

人都孝順她，夜晚在就寢前一定替她按摩，並且幫助她烹飪。所以，我現在還會切肉、燒魚以及做一些菜肴。我在她縫紉或紡織時也幫她的忙。同時，祖母一有了一點錢就口口聲聲地說，要給我積蓄學費。我的祖母在我中學畢業前死去，臨死的時候還說：無論如何要把這個孫子送到東京去，因為自己在使兒子求學方面是失敗了，無論如何必須讓孫子去求學。

### 在小學校第一次罷課

我受着善良的祖母和惡劣的外祖母的撫養，像前面所說的，從幼年起就親身接觸到社會的罪惡面，因此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富有對弱者的同情，具有要保護這些人不受不正當壓迫的志願。在小學五年級時舉行了第一次的罷課。校長不是琉球人而是外地人，像到琉球的一般的外地來的教員一樣，他是一個殘酷而又品質惡劣的人。學校中也施行所謂鹿兒島的斯巴達式的教育，拳打腳踢，罵琉球人“混蛋”。這種情況使我們的反感高漲起來，舉行了罷課。這次罷課的經過是這樣的。在上完体操課的時候，先生沒有行“解散禮”就走了，於是我們就堅持既沒有行“解散禮”那就不能解散，大家立即回家，一連三天實行同盟罷課，我們還主張，如果今後對琉球人拳打腳踢粗言侮辱，就不再到校，終於教師方面讓步而變得老實了。我在小學校從入學到畢業一直擔任級長，所以自然而然地也就領導了這次罷課。

在中學並沒有發生過罷課的事件。但因我非常愛胡鬧，所以經常和先生吵架。有一次閑院親王夫婦來琉球。當時在他們經過的路旁居民都要跪在地上歡迎，甚至中學的學生也得拿着大槍站在道旁護衛。閑院親王的那副臉，還沒有給人什麼不好的印象，但是親王夫人的瘦小的臉上却塗得像牆壁一樣白的粉，簡直活像一隻白老鼠。我心中想，對於這樣人大可不必如此鄭重其事地歡迎。我就稍為露出了一點這種感想，於是問題發生了，險些竟被開除學籍，幸而大家幫忙，才得平安無事。

琉球这地方的中学先生差不多都是从外地來的人，對於琉球人特別輕視，所以我們總是團結一致，進行反抗。先生們不論哪一個都是馬馬虎虎考取了教師資格而流浪到琉球來的，品質惡劣，在十五、六個人中，從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只有兩、三個人，如果是從大學畢業的，一來到這裏，立刻就可以成為主任教員或校長。

其中被認為特別不好的先生，是後來成為“講談社”社長的野間清治。野間是我在中學一年級時的漢文教師，但他對漢文差不多是一點不懂。在教室中不是講“石童丸”<sup>①</sup>的故事就是說評書或唱“浪花節”<sup>②</sup>小調。而且他把妓院當做宿舍，每天從妓院醉醺醺地來上課。他，不用說，也是馬馬虎虎考取了教師資格而流浪到琉球來的那種貨色，每月收入約有四、五十元，當時住妓院一個月不過十元左右，即使從妓院到學校三公里遠用洋車接送，盡量吃喝和玩弄女性，也不過二十元就夠了，所以過得很舒服。因此對於像他這樣人來說，琉球的確可以算是天堂；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却是地獄。

### 從第七高等學校學生到代課教員

沖繩中學畢業後，我在東京過了一年的補習學校的生活，然後進入了第七高等學校；因為窮，沒有學費，起初寄居在一個舅舅的家中，他是母親的異母弟。這個人並不怎樣壞，但是他的女人却很兇，因為我是琉球人生的，拒絕和我同桌用餐，起居一切讓我和僕人在一起。家中雖然有浴室設備，但我進去洗澡，她們却說我骯髒，不許我洗。因此，我只好到街上的澡塘去洗。受這種侮辱實在不能忍耐下去，我就搬進了學校宿舍去住。不過，這樣一來，錢就不夠用了，結果，我只念了一年高等學校便中途退

① 這是一種傳說的故事，內容描寫日本古時候有一個叫加藤左衛門尉繁的人到高野山上當和尚後，他的兒子石童丸到山裏去尋找他的經過。——譯者

② 日本的一種通俗的曲調。——譯者

学，在1913年(大正二年)回到琉球。

在高等学校，有一个叫做松本的英語教師，他經常欺侮琉球人。我一提出什麼問題時，他總是呵斥似地說：“你这个琉球人，還有什麼可以問我的！”結果我被激怒了，發動罷課。我向大家大大地進行鼓動說：為什麼侮辱琉球人？於是，舉行罷課，最後把他驅逐到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去了。我認為高等学校不过是教點外國語的地方，實在沒有意思，因此，我就把學校的功課放在一邊，閱讀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專讀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當時“萬朝報”載有守田有秋的“德國通訊”和石川三四郎的“法國通訊”，其中經常報道社會主義運動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閱讀這個報紙，回到琉球以後，我仍然繼續讀“萬朝報”。在琉球，或當小學校的代課教員，或當郡公所的書記，鄉居了約有四年。

當小學教員，每月薪金不過十元左右，生活無法維持。同時因為是代課教員，升職、加薪都不可能，生活永久也不會富裕，所以我就根本不打算長期做教員。我不按照教科書來教課，按照自己的意思隨便教。當時的教科書上充滿了忠君愛國的思想，但我不教這些東西，主要的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近代文學、特別是俄國文學為教材來教課。我教給學生們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的作品，告訴他們，「不勞動的人是墮落，不勞動就是罪惡。常給他們講“傻瓜伊凡”一類的故事。

### 郡公所書記

後來，我當了郡公所的書記，當時擔任整理稅收的工作。在琉球，由於土地被分割得很零星，所以一分、二分、三分小額稅款非常之多。遇到有拖欠稅款的情形時，我們就得領取一天兩元錢的旅費出差整理。實際說來，這種欠稅案件，有一元錢就夠整理幾十件。因此要是用自己的出差旅費把欠稅繳上，倒反而簡單。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事情既麻煩，又可憐，令人目不忍觀。因此，我召集村中的人在一起，向他們解說：“這種稅制是不合理

的，大家如果繳納了稅款，我們就可以不用來出差，這對於諸位是有利的。”我就這樣說服大家，發感謝狀給繳納的人，使他們繳納。

在郡公所做僱員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郡公所的會計亂得一塌糊塗，我仔細檢查一下，發現購進的物品的單價貴得驚人。一個一角錢的茶杯，賬上寫着一元或一元五角。我想此事未免過分好笑，招集商人前來投標。果然不出所料，一元或一元五角的東西居然落到一角錢。不過，如今買一切東西都付給現款。採用這種方法以後，一向是每年預算不夠，甚至不得不挪用到下一年度預算的情況改變了，不但全部償清了前一年度的欠債，用本年度的預算買下了當年必需的全部物品，而且把以前值班房的破爛的被褥、毛毯全部更換新品，預算還餘剩了一成多。

但是，做了一年我就被免職了。這是因為商人方面發出怨言說：“放任有這種手腕的傢伙在這裏，明年的預算將要減少，還不知道要搞出什麼花樣來”。商人過去向經管會計的人勾結行賄，從中吃甜頭，現在吃不到了。

### 再往東京

我從很早以前就想再到東京去，尤其看到這批壞蛋的得勢，愈益加強了進京的想法。恰好這時是歐洲戰爭將要結束前的繁榮時代，都市用人的地方多，到東京去也有希望能夠半工半讀，所以在1917年（大正六年）三月，我二十四歲時又重新進京。

到東京時，有人介紹我到當時在築地的遞信省儲金局去做僱員，每天工資五角。因為休假日不給工資，每月收入不過十三元五角左右。當時遞信省內部完全是騙人的，對待工作人員有如牛馬一般，這種惡習直到今天還存在着。在這些工作人員中，有許多青年是胸懷大志、為了苦學而從鄉間進京的，但他們卻被廉價地使用。他們每月的工資很低，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從家中要些補助。他們也不發動罷工。既然是胸懷大志，他們生怕因

举行罢工而受到处分，将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不發動罢工。現在，遞信省也是極少發生罢工的地方。當時我的工作，是寫寫信封，更換存款摺，或者揹着公文袋到其他科室去整理，做這一類下等而又下等的工作。在這裏呆了有九個月，晚間我到日本大學夜校的法科上學。說是去上課，實際只是在日本大學掛個名，真正去上課的時間不過一個月左右。我當時感到大學這個地方簡直是無聊透頂。雖有金森德次郎、山岡萬之助、鳩山秀夫等人前來講課，但是所講的課，實在是信口胡說，並不高明，遠不如閱讀他們的著作倒好些，因此我就不去上課了。

### 參加米騷動事件

1918年(大正七年)當我在儲金局工作的時候，發生了米騷動事件。參加米騷動的羣眾，一時激動，襲擊了當時的米店。實際說來，米價的上漲使人民陷於無法生活的境地，像我們學生們付不起公寓的房錢，也是出於米商囤積居奇提高米價所致。於是各方面的憤怒集中起來就爆發為全國性的米騷動。我也受到激動，參加了這次暴動。我是在東京的兩國附近加入了暴動的。暴動從深川開始，襲擊了兩國、神田一帶的米倉，然後向萬世橋方面推進，在這裏遇上坐着卡車來的警憲，他們揮舞棍棒從上面打下來。大家在雨也似的棒打之下匍匐前進，於是他們又從兩側毆打過來，投擲石子。這樣，大家你推我擁，前進到萬世橋。到達萬世橋的時候，軍隊出動了。軍官拔出指揮刀來，像是發出了射擊的命令，但是兵士們並沒有開槍。不過，因為兩側受到軍隊包圍，後面有警憲追打，我們終於在這裏亂成一團開始狼狽地逃跑了，好像死裏逃生一樣。我逃向本鄉方面。現在還記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上了天神坂，至於以後怎樣逃走的，頭暈眼花，完全不清楚了。不管怎樣，我總算回到了神田的公寓，沒有遭到逮捕。這次米騷動是我參加大規模的羣眾性運動的第一次經驗，我那時痛切地感覺到警察的殘暴。我對於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不惜採取任何殘酷手段的政府的暴力行為，深為憤慨；這種憤慨，一直有增無減。

暴動發生後不久，我便離開了遞信省的僱員工作，去當小野律師的書僮。我以為這個工作對於自己的學習會方便一些，但是在這裏只做了十五天就辭職了。使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要在接電話或接待客人時採取非常卑躬屈節的態度。離職的直接原因是，有一次我听錯了律師的一位貴賓通知在早晨從東京車站動身的電話。我問他：“是午前呢？還是午後呢？”他回答說：“午後”，我就照樣報告律師。於是他在午後往東京車站去送行，但客人在午前已經動身了。律師回來後立即把我痛斥了一頓。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法再做下去，於是在任職十五天後就離開了。然而我另外又找不到工作，最後積欠了兩個月的公寓的房錢，被公寓主人驅逐出來。自是之後，我當過區公所的臨時僱員，做過法院的抄寫工作，直到做了東京府公署的僱員以後，生活才勉強獲得安定，能夠繼續學習。

### 任候補法官兩個月

這樣繼續了三年的苦學生活，我在進京後第四年、二十七歲的時候便當上了律師。

當律師並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手段。我認為當律師最便於從事社會運動，因此我就當了律師。當時是律師得勢的時代，不論到哪裏，一提起律師就吃得開，所以我想這對於從事社會運動來說是最適合的頭銜。事實上，這個招牌也的確是有效的。不過，我為了要當律師，先做了兩個月的學習法官。原因是這樣：

律師考試和推事、檢事的考試是相繼舉行的，後者的考試在前。我同時參加了這兩種考試，由於在應推事檢事考試期間弄得精疲力盡，到了應試律師時體力已經不支，結果，司法官考試被錄取了，而律師考試則名落孫山。但是按照規定，考取了司法官的人只要一度就任候補法官，然後再辭職，就具有當然的律師

資格。因此，我首先在東京地方法院掛了個名，一天也沒有去上班，過了兩個月後趕緊辭職改充律師，就在山崎今朝彌律師手下開始工作。

這一年，1920年（大正九年），山川均、堺利彥等人組成了社會主義同盟。我過去曾到山川等人那裏搞過社會主義運動，所以在當律師以前，先參加了這個同盟，在山川的領導下開始活動。

### 律師時期

由於這種緣故，我雖然當了律師，可是幾乎並不辦理普通案件的辯護。我着手辦理的，只是有關勞資糾紛和租房人聯盟、社會運動家的案件的辯護。因此，我對於普通的法律是知其大概的，至於它的細節手續就不懂得了。所謂律師，一般都是法律技師，只知道法律知識的運用，我是把這種法律技術運用到政治方面。這種具有特殊傾向的律師經驗對於幾年後在法庭上的鬥爭起了很大作用。

我做律師後最初辦理的案件，是1921年“五一”勞動節，民族研究家橋浦泰雄等十四、五人因抗拒警察被加以妨礙執行公務罪而遭逮捕的案件。

在這次公審中，花井卓造、山崎今朝彌等著名的律師都親身出馬，初出茅廬的我也夾雜在他們中間。輪到我論辯的時候，我講了許多話，於是山崎今朝彌笑着說：“這個傢伙有意思，初次出庭論辯，就那樣滔滔不絕。”山崎說，他自己初次出庭論辯時曾經發過抖。在這一點來說，我是勁頭十足的。

在我經手的案件中最有趣的，是關於北海道旭川的宮內省官地的佃租案件。

一般說來，宮內省官地除了租給直接的佃戶外照例是不出租的，地租也極其便宜。在1923年，一日畝的地租規定為一角錢，一段地規定為一元左右。但是旭川附近的廣大的官地被一



个在淺草雷門街經營白蘭地酒店的商人神谷傳兵衛全部包租了。神谷計劃在這裏種馬鈴薯，從馬鈴薯中提取酒精，然後再製造白蘭地。因此，實際耕種的人成為間接佃戶，他們向神谷繳納一段地十五、六日元的普通地租。事件就在這種間接佃戶的糾紛中發生了，他們要求糾正這種欺騙行為，排除神谷而直接租賃；宮內省無法表示反對，佃戶方面獲得了勝利。以這次勝利為開端，整個北海道發生了租佃糾紛，僅次於宮內省的最大的地主——擁有十五萬町步土地的蜂須賀農場，也發生了這種糾紛。

然而，在我以後入獄期間，這些佃戶們吃了很大的虧。宮內省方面對他們說索性把地買下吧，加上調解糾紛的經紀人從中花言巧語，終至達成了買下佃地的協議。這是宮內省極為狡猾的作法，使佃戶們受到極大的欺騙。這話怎麼說呢？因為，對佃戶來說，出廉價地租去租地耕種本來是很有利的，但是他們受着土地歸於自己的美名所誘騙，從勸業銀行借得大量款項來買土地，在經紀人取得六、七萬元的報酬而逃走之後，結果，弄得付不起借款的利息，經營失敗，成為勸業銀行的借款奴隸。這是宮內省利用農民喜歡獲得土地的心理假裝施恩而高價出賣的例子。直到今天，政府所施行的一切建立自耕農的辦法都是與此同一目的的。這就是說，利用農民對土地的心理，口頭上說是為了使他們成為自耕農，實際則為圖謀金融資本的利益。受益的不是農民，而是勸業銀行、農工銀行，這些銀行非常低廉地估計地價以貸給款項，如果農民無力償還借款時——實際說來，無力償還的情形居最多數——就按照低廉的估價沒收土地，然後高價賣出謀利。勸業銀行、農工銀行都是因這種利益而發財致富的，當然，地主及資產階級政客之流也從中分肥。

### 組織日本共產黨

社會主義同盟不久即被迫解散，以後產生了許多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如：水曜會、木曜會、曉民會、新人會等。

水曜会是青年們以山川均和荒畑寒村为中心而結成的团体，在当时的會員中现在还生存的，有山川、荒畑、井之口政雄和我，後來完全墮落了的稻村隆一、横田千元等也曾加入过这个組織；已故的有西雅雄、田所輝明、上田茂樹、高桥貞樹、杉浦啓一等人。木曜会中有堺利彦、中曾根源和，曉民会中有高津正道、高瀬清、川崎悅行、近藤荣藏、高野实，新人会中有志賀义雄等人。此外还有無政府主义者組織，其中有大杉榮、和田久太郎等。

1921年，和華盛頓會議相对抗，在莫斯科召開了远东各國人民的代表大会<sup>①</sup>，我代表水曜会出席这个會議。参加这个大会的有曉民会的高瀬清、無政府主义者組織的吉田一、和田軌一郎以及兩名出版印刷工人。此外还有从美國前來的片山潛、当时任讀賣新聞社社員的鈴木茂三郎及其他許多的人参加。自从日俄战争时期片山潛代表日本人民出席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和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的普列漢諾夫握手以來，工人的國際關係曾經長期中断，这个大会初次得到恢復的机会。大会上，朝鮮、中國、蒙古、爪哇以及日本等各國人民的代表聚首一堂。在这次會議上強調指出：日本也必須組織共產党進行統一的活動；共產主义者組成小組或小团体各自分散行動是不妥當的。

在我們經過这次洗禮歸國以後，1922年（大正十一年）七月五日，日本共產党誕生了。这是以水曜会、木曜会、曉民会为中心团結了共產主义的小团体或个人而組成的。立即加入这个組織的有：總同盟的野坂同志和山本懸藏，結成無產階級社的市川正一、市川义雄兩兄弟和佐野文夫、青野季吉，鐘錶工会的渡边滿藏，以及桥浦時雄、吉川守國，还有大阪的花岡潔、鍋山貞親、

<sup>①</sup> 远东各國人民的代表大会，正確地說，是远东共產主义的革命团体第一屆大会。这个大会是在共產國際倡導下於1922年一月至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它以組成远东共產主义運動和支持民族革命運動为主要目的。

中村义明, 京都的辻井民之助、國領伍一郎、谷口善太郎、半谷玉藏, 水平社的岸野重春, 教授及学生方面的志賀义雄、黑田寿男、淺沼稻次郎、荒井邦之助、佐野学、猪俣津南雄、平林初之輔、黑田礼二等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於 1922 年七月十五日在东京澁谷的一家樓上举行的。當時决定了極簡單的党章和党在目前的任务。接着, 同年十一月, 在石神井的一家飯館裏聚会, 進行了綱領的審議。審議結果, 綱領的第一項是廢止天皇制度, 第二項是廢止樞密院、貴族院、參謀本部, 此外还有实行八小時工作制度, 沒收大地主土地, 保障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 廢止常备軍等, 而它的中心問題在於清除各种封建制度。當時, 廢止天皇制度成为大問題, 佐野学反对这一項。这充分地表明, 从當時起, 他就犯了根本的錯誤。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选出堺、山川、荒畑、高津、桥浦、吉川、德田等人为中央委員, 堺为委員會主席。党以堺和山川的家为中心, 進行了的確是小規模的活動。因此, 在 1923 年举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報告說有規模非常小的日本共產党参加。

在 1922 年十二月, 青年共產同盟誕生了。當時, 这被称为共產主义者青年同盟; 其創立委員由河合义虎、高瀬清、佐野学、荒井邦之助、猪俣津南雄、德田等五人担任, 河合为委員會主席。

### 勞動战綫的統一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我从莫斯科回來不久, 正是 1922 年六月, 日本也掀起了要求全國工会統一的運動, 在大阪的天王寺举行了有各主要工会参加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 總同盟方面主張应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統一, 大杉荣一派的無政府主义者領導的自由联合則主張实行联合組織, 双方意見衝突, 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最後被警察署長命令解散, 好容易召開的大会結果弄得一場糊塗。當時共

產黨支持總同盟方面的實行中央集權制工會統一的主張，通過組織，大力鬥爭，但終於沒有成功。不過，當時工會運動的情況是這樣的：甚至在一個工廠也沒有健全的組織，因此要想全國規模地實行集中組織，的確是有困難的，同時共產黨方面的指導方針過分陷於主觀的錯誤，這是必須檢討的。我那時處在難於向外界露面的境地，住在大阪日本橋的一家小旅館裏，和同志們秘密聯繫。

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於1923年（大正十二年）在市川市的一直園舉行。當時的議案主要是修改黨章和改選中央委員。荒畑勝三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堺利彥、佐野學、小岩井淨、橋浦時雄、吉川守邦等當選為中央委員。我和山川均、高津正道等人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未能當選為中央委員，其中因為有這樣一段有趣的經過：當時，在共產黨內是否承認“議會鬥爭”成為重大的問題，圍繞這一問題，我和曉民會系的人們之間展開很大的爭論，終至兩敗俱傷，雙方都從中央委員落選。這就是說，當時我主張，應當進行議會鬥爭，一方面，反對山川均一派的否認議會鬥爭論和佐野學的反對普選論，同時另一方面對於堺利彥一派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議會主義又徹底地加以批判。因此，曉民會系的人們擁護堺利彥，以我在莫斯科陰謀驅逐堺利彥出黨為藉口，作為黨內問題提出來，趁着我為了作關於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報告而赴上海的期間，給我二年間停止職務的處分。但是不久我回國後聽到這種情形，強烈地反對黨的這個決定，黨又取消了這種處分，並以我和曉民會系的人們都不當中央委員為條件，把這事件予以了結。當時黨在政府當局的鎮壓之下，受着非常嚴厲的取締，而在德國，革命風起雲湧，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運動也在蓬勃地發展。我主張應當配合世界的形勢，積極努力擴充黨的勢力和爭取黨員。但是，許多人顧慮當局的鎮壓，並不十分贊成我這主張。那時，日本革命的形勢也有相當進展，連現在社會黨的西尾末廣也曾一時加入在黨的影響下的工會運

動中進行活動。

### 早稻田大学的反軍訓鬥爭

那一年(即1923年)五月發生了所謂早稻田大學軍訓事件,接着在六月四日發生了對共產黨的檢舉。這個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時,日本田中義一內閣及其他軍國主義者竭力想在全世界主張裁減軍備聲中把軍閥勢力實際上保存下來。早稻田大學有一個名叫青柳篤胤的教授,和他們相勾結,企圖利用學校教育培養候補軍官(這是後來軍事幹部候補生制度的前身),在大學中成立了軍事訓練的組織,甚至舉行了成立典禮。因此,屬於早稻田文化會或建設者同盟的進步學生組成的早稻田文化同盟,便在共產黨指導之下,開始了鬥爭。站在這次反對運動的前列而進行鬥爭的,是澁谷榮一的庶出的兒子伊藤寅之助。這些人便在出席軍訓團體成立典禮的白川義則中將的面前,正面反對把軍事訓練搬進學園裏來。當他們要舉行早稻田大學學生大會進行鬥爭的時候,以二·二六事件被槍殺的北一輝等人領導的早稻田大學日本拳術部為中心的暴力團體——所謂早稻田縱橫俱樂部,在大會上訴之暴力行動,於是學園成為流血鬥爭的場所。這樣,日本當局認為盼望已久的時機到了,他們利用這種騷動實行鎮壓,而他們的根據,據說是有一個經常接近佐野學的名叫澁谷的警務廳特務從佐野學研究室偷竊了文件和資料。事實上,這是他們對於早稻田的軍訓事件的一種報復行為,為了達到學校軍國主義化的目的而故意製造出來的。指揮這次檢舉的是前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松太郎,最先被捕的是堺利彥。由於這次事件,野坂參三、市川正一、杉浦啓一、西雅雄、渡邊政之輔、上田茂樹、田所輝明等同志以及我都進了監獄。而有趣的是,在檢舉的前兩天,共產黨已由某方面得到了消息,設法令佐野學、高津正道、近藤榮藏等意志不堅定的領導者以及當時工會運動中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如山本懸藏、辻井民之助等人趕緊逃走。這

些人，先往中國，後又亡命蘇聯。

### 少年同情者

那時我住在一個朋友家的樓上，不知道怎樣地被發現了，便衣警察前來搜查。恰巧附近住着一個和我非常熟識的十二、三歲的孩子，偷偷地來告訴我說：“叔叔，警察來捉你了。”我立刻把東西裝在皮包裏準備逃走，這時，朋友的母親堅決地对警察說：“這裏沒有叫德田球一的。但是，他和我的孩子是朋友，也許他可能到我兒媳婦家裏去了。”因為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說的話，特務也許是深信不疑，於是就走了。因而，我從後門偷偷溜跑，好容易脫離了虎口。那時我為了組織工作，約好必須前往京都和名古屋一行，但因沒有錢，始終無法成行。正當我在石川島造船所的高山的家裏商談籌措資金的時候，高山的兩個孩子，一個七歲左右，另一個十歲左右，都喜愛共產黨，突然來告訴我們說：“爸爸，來了！”於是我知道警察又來了，立刻順着屋頂逃跑。恰好隔三家人家，有我認識的一個工人的家。我在这家的壁櫥中藏了約有一小時，認為可以平安無事了，高山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着出來，發現在前面一百多公尺遠仍然有警官在監視着。因此，我們慌張地掉回頭來，到朋友家中，央人叫了一部出租汽車，坐上汽車打警官面前駛過去，逃走了。那天晚上，我宿在朋友的家中，第二天我從新橋車站逃向名古屋，還到大阪去了一趟，辦完事又回到東京。高山看見了我，勸我無論如何要到福島的朋友那裏去躲避一下。但我認為這也只不过坐一年左右的監牢而已，與其到處逃避，還不如進去倒好些，於是和山崎今朝彌律師商量，決定向檢察署自首。那個時候，逮捕我的理由是我在一個工人的集會上談到有關在革命發生時組織暴動的話，他們認為這是煽動暴動。我說：“這樣事情不能成為煽動罪”。檢察官說：“不，這是煽動罪”。這樣，我和檢察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最後仍是被送進了市谷的監獄。還沒有吃晚飯，我就被送進陰

暗的牢房裏，不久就聽說：“吃飯吧！”但端來的只是上面放着一點點青菜的粗麥飯，幾乎令人不敢設想這是人世間的食物。我把它完全吃光了，還向看守再要一碗，這使他瞪起眼睛感到驚訝。第二天，我很快地就被預審推事提審出庭。當時，普通犯人提出獄外時都是戴着寬邊大草帽遮着臉不讓人看，但我向要給我戴草帽的看守大聲呵斥說：“我並沒犯了什麼無恥的罪，露着臉一點沒有關係。戴上，什麼都看不見，我不要戴。”這樣我便大搖大擺地走出來，看守只是低聲說：“好蠻橫的傢伙！”却絲毫未加干涉。我認為在監獄中，最初的振作是重要的，事實上的確如此，例如三·一五事件時，水野成夫剛一入獄就完全嚇破了胆，後來還追述說：“當監獄的房門砰然關上時，就感到像置身於死亡的深淵似的”。像這樣的人從一開始就吃不下飯去，後來必然要墮落。水野為了要出獄，完全喪失了革命的信心，終至成為取消派，甚至墮落到成為特務。

### 在市谷監獄遭逢大地震

在市谷監獄，遇到九月一日的大地震。監獄中吃午飯的時間比較早，那一天嘩啦嘩啦地開始激烈震動正是我們吃完午飯的時候。

牢房裏的每個房間都有大柱子支持着，所以那樣激烈的震動也是經得起的，而不必有所擔心。但是，辦公室方面，因為房間既大又沒有支柱，搖撼得非常厲害，屋頂上的瓦片整個都掉下來了，立刻造成很大的混亂。我的單間牢房緊挨着辦公室，對這一切听得十分清楚。但是看守卻以沒有上級的命令為理由不肯打開牢房的門。我憤慨地斥責說，在這種危急的時候還有什麼必要等待命令。於是過了一會，看守前來開了我的牢房門上的鎖。我跳出去，立刻到辦公室去看，被放出來的只有我們這一夥共產黨人，其他犯人在這樣激烈的地震中仍然被關在監房裏。我又斥責說：“把大家都放出來！因為危險，要把大家都放出來！”

結果，才決定把大家都放出來，看守開了牢房的鎖。大家每人拿着一條薄被和一塊蓆子，怒氣滿面地衝了出來。

但是，剛剛過了正午，屋外的太陽烈火似地照耀着。大家長期被關在監房裏，突然走到外邊，在烈日之下，有的人就因中暑而暈倒。我雖然沒有這樣，但渡邊政之輔和田代常二兩同志因中暑而引起全身痙攣，眼看着臉上沒有人色了。和監獄當局交涉把中暑的人們移到監獄中的病房去，我們總共八百多人在院子中間聚成一團。似乎即在把我們從監房放出的同時，監獄方面，趕緊通知了軍隊，不到日落的時候，軍隊就出動了，包圍在監獄的大牆外邊。傍晚，他們進到院中，槍上插上刺刀兇狠狠地把我們包圍起來。

那一天三點鐘左右，我向院中八百多個難友做了一次演說。我說：“現在，外面的情勢非常混亂。我們的家眷親屬們，一定也都遭到了地震或火災。因此，在這種特別的情形下，我們應該要求監獄立刻把我們全部釋放。我們應該選出代表立即和官方交涉”。

大家都贊成我的提議，從每一牢房推出一名代表，當場組成代表委員會。這是監獄自治會的開始，以後就成為犯人們的自治組織。在那樣的混亂情形中，犯人用自己的手，把生活上的所有問題，從同監獄當局的交涉到吃飯問題，都處理得很好。這可以說，在監獄中實現了民主主義。雖然是盜賊和殺人犯的聚合，而這個自治組織卻能夠把事情管理得很好，這一事實在各種意義上，甚至在今天也是值得重視的。

組成了代表委員會以後，我也作為委員之一，立即向監獄進行“要求釋放”的交涉。但是，由於軍隊的聲援而完全強硬起來的監獄當局，頑強地不接受我們的要求。於是，代表委員會又改變主意，提出新的要求說：“如果實在不許可釋放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末，應該准許我們的代表者幾個人到外面去詳細看看外面的情況，回來報告給大家”。監獄方面連這個要求也不肯答應，



但由於我們堅持鬥爭的結果，監獄當局終於被迫同意由他們向我們作報告。然而，監獄當局畏懼我們這樣的活動，藉口犯人中間發生不穩空氣，藉助於軍隊的威力向我們挑起反攻，結果，我們竟被戴上了手銬。要給八百多人每人戴上一付手銬，这在當時是沒有這樣準備的，於是，像我和一些人还是一個人戴一付手銬，後來他們就粗暴地使兩個人合戴一付手銬。一個人戴右手，另一個人戴左手，像三足競走似地結成了許多組。最粗暴的是，他們要給在病監中的渡邊政之輔和川崎悅行等同志戴手銬。我看見了這種情形，向訓導主任提出抗議說，如果給病人戴手銬，我就一定要起訴，認為這是有意殺人。這樣一來，敵人才打斷了念頭，把他們送回病監。

發生地震的第二天，下起雨來了。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又被關進牢房裏。又過了一天，軍隊集合在像扇形似地排列着的牢房的中央廣場上，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拖出來，開始更換牢房。稍為表示反抗的人，就被拳打腳踢，施以種種殘酷暴行。這照例是“在天皇的名義下並依照他的命令”幹的。他們看到牢房內部的嚴格壓制因地震而一時鬆弛，為了重新恢復以前的狀態，就採取了這樣一種準備行動，企圖使大家就範。在這中間，杉浦啓一被打得很重，不得不躺着呻吟了一個星期。

此後不久，一幫渾身是血的人們接連着用卡車運來了。這些都是以“暴動嫌疑”而被逮捕的人們，其中有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朝鮮人和工會及農民運動的鬥士們。

過了一個多月，監獄又重新恢復原狀。於是，又來了幾十個新型的青年，也就是說不像犯人的普通人。當時因為地震，住單間牢房的犯人所用的運動場壞了，監房前的走廊就成了運動場。我在他們每次經過我的牢房前時都和他們談話。他們是退伍軍人。我打听他們入獄的理由，他們說是因為在地震的時候，朝鮮人、中國人、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到處被殺害，而把他們套上了這種殺人犯的嫌疑。他們說，他們因為是退伍軍人，被軍

官們召集去加入了慘殺集團，但是他們只是奉行軍官的命令在街上東奔西走，並未殺過人。不過只是因為他們拿着槍，所以被加以慘殺者的罪名而遭逮捕。這就是說，把罪名完全推到士兵們的身上，真正的犯人——軍官和“在鄉軍人會”的會長等倒反而躲在一邊假裝無事。我鼓勵他們說：“不管怎樣，千萬不要上檢察官的當！”同時，我還和自由法曹團聯繫，請求他們對於軍閥、警察的這種可憎恨的詭計進行徹底的鬥爭。他們根本就是冤枉，因此大部分都無罪釋放。但是，可以想像得到，這些人對於隨便把殺人這樣重大的罪名強加在自己身上所感到的憤慨，決不是尋常的。

### 監獄成為學習的地方

監獄本來談不到是什麼好地方，但是有一個好處：人住在這裏，和世間隔絕，倒可以專心讀書。在社會上，終日忙忙碌碌，又要飲酒，又有萬念牽心，而在監獄就沒有這些麻煩。因為任何掛慮都沒有，所以讀起書來，什麼書都可以專心地讀下去。當然，在獄中，想讀的書並不能自由讀到，相反地，我們真正想讀的書大多數是不許讀的。但是書的價值一方面也在於閱讀的方法，如果閱讀方法正確的話，從任何書中也可以有所心得。好書固然有用，無聊的書也有無聊的用途。

在市谷監獄時我讀了各種的書，例如澁谷榮一的自傳、安田善次郎的自己的得意經驗談和訓話等，我都隨便讀過。這些書的字裏行間儘管說得頭頭是道，但充分暴露了如何追求大的利潤，如何極端巧妙地、極端徹底地剝削工人等資本主義的詭計。在這種意義上，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黨的“必讀之書”。例如，安田善次郎這個人非常討厭投機行為，絕對不許可自己的手下的人染指投機行為。他說，人一旦嚐到投機發財的滋味，就會利令智昏，容易誤入迷途。事實上，留下這種訓戒的他本人倒是拚命投機，而且他的投機方法是極其兇猛而大膽的。總之，他所說的

“反对投机”乃是由於恐怕他的部屬因熱中投机而荒廢了自己的職務，歸根結蒂，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發財的一种說教而已。只要讀一下他的說教，一切詭計就可以了如指掌。

### 元老派的解党論和党的強化

地震之後出獄一看，以德國革命的失敗为轉折點，全世界的反革命的浪潮湧向前來。这种形势，列寧称之为“暫時的平衡時期”。有人認為这个時期一直繼續到1929年年底的美國經濟大恐慌時代，共產國際則認為从1927年開始的中國革命結束了這一時期。總之，我們的出獄是在这世界資本主义的暫時局部穩定的時期，革命的勢力在世界各地普遍低落和遭到腐蝕的時期，日本也沒有例外。

在堺、山川等党的元老以及佐野文夫等人中間，發生了很大的動搖。他們說在日本組織共產党是不可能的，提倡暫時把党解散，並主張所謂自然發生論，認為革命在時機到來時自然就会發生。事实上，党内有很多懦弱分子，他們對於國際革命的低落感到失望，並且對於今後有相繼被檢舉的可能抱着恐怖心理，为了使这种失望和恐怖心理合理化，便吐露了这样的意見。党內的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和青年們对此表示反对，主張把党加以改組並繼續下去。在幹部中，荒畑寒村和我是主張这种反对論者的先鋒。荒畑當時还非常樸实，虽然有些生硬的地方，但对党却忠心耿耿。共產國際也不同意这种解党論，1924年（大正13年）一月，取消派和我們双方在上海相会，通过了“上海綱領”，普通也称之为“一月綱領”。取消派的代表也贊成了这一綱領，但是他們歸國後又恢復了解党論而脫離了党。元老們也增加了恐怖心理而並不改變其主張。

因此，我們立即組成了党組織加強委員會，委員會中積極的活動分子很少，我就担任了組織的負責人，推進这种加強工作。

荒畑和佐野學参加了这个組織。不过佐野在这以前一直住

在外國，對於鎮壓時期以及鎮壓後的國內情勢感到生疎，只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意旨而不是由於革命的堅強意志才去參加的。總之，黨就這樣強化起來了，不久後，渡邊政之輔等人加入黨的幹部，工人出身的人們和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就任了新的黨的總書記和組織部長，開始工作。那年九月，發行了黨的公開的機關報“無產者新聞”。

但是，在這1924年年底發生了勞農黨的組成問題，接着在第二年三月發生了評議會的分裂問題。黨的方針不是要勞動戰綫的分裂而是力謀它的統一，即主張使工會統一並組成統一戰綫。在這以前，1924年五月，赤色工會國際的負責人來到上海，佐野學、渡邊政之輔和我三個人前往會見，在那裏製成了強調工會運動的統一的綱領，普通稱之為“五月綱領”。我們攜帶這個綱領趕緊從上海回來，但回來一看，在十天以前，左派因不能忍耐已告分裂，所以這個綱領沒有來得及生效。

分裂的經過是這樣的。總同盟中首先產生了反幹部派的關東工會評議會。但當時的方針仍然是要避免分裂，在其他所有的工會中組成反幹部派，一方面統一工會，一方面清除一部分墮落幹部。然而工賊們却用盡一切方法製造分裂。如果革命的工會的幹部反對工賊們的這種卑鄙行為，工賊們就將這些幹部開除；如果幹部所屬的工會反對這種開除處分，那末他們又將工會開除。這迫使有良心的工會形成不得不分裂的狀態。於是有了良心的分子或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是這種情況，倒不如分裂了反而易於活動而且有利。1925年五月，作為全國性組織的工會評議會組成了。當時工賊們的陰謀活動，的確令人不容漠視。分裂問題，最初發生在關東，繼而發生在關西。在關西方面，目覩工賊們的過分的橫暴作風，甚至中間派的人們也和左派結合起來。在關西，大阪總同盟在主席野田律太的主持之下，以分裂問題為中心召開了支部大會。會上，工賊們在西尾末廣的領導之下，為了使左派分裂，胡搞一陣。連主席野田最後也憤慨

地說：“和這些傢伙們不能一起搞下去”。他便和左翼携起手來，因此超過工賊們想像以上，多數人參加到左派來。根本問題在於這些工賊們的挑撥。所以，他們到現在一有機會還譏諷我們是左翼幼稚病的分裂主義者，但是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分裂主義者正是他們。

不過，這次評議會的分裂仍然是我們的失敗。失敗在於我們未能擺脫他們的挑撥的欺騙，未能充分運用作為革命的反对派而始終留在總同盟內的戰術。

受了這種工會運動的分裂的影響，無產階級政黨運動也分裂成為勞農黨、勞農大眾黨、社會民眾黨這三個政黨。農民協會也分裂成為左右兩派。右派與官方、資本家相勾結壓迫左派，使農民協會走向右傾。我們以“無產者新聞”為武器進行鬥爭，反對這種分裂化，謀求工會的統一，因此設立了工會會議，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最初的分裂終於未能克服。評議會的分裂對於我們是個痛苦的經驗，迫使我们進行了嚴格的自我批評。對於今天的工會運動，這種痛苦的經驗也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

當時我們的弱點在於未能充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武裝自己。評議會分裂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於這種理論上的缺點所造成的錯誤。結果是：一方面山川主義在工會中，另一方面福本主義在整個黨中有了橫行的基礎<sup>①</sup>。現在我們在理論上已具有充分的實力，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吸取當年的經驗，加強學習革命的理論。

這年（1925年）夏，我為出席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到共產國際去<sup>②</sup>，在第二年五月回國。七月初，因第一次共產黨事

① 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都是發生於日本共產黨成立初期的錯誤的“左”傾的機會主義理論。前者是山川均所提倡的，主張經濟主義的取消論；後者是福本和夫所倡導的，企圖以小資產階級的抽象理論使黨脫離羣眾。

——譯者

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於1926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譯者

件被判处入獄。禁錮十个月，羈押期間算为四个月，在監獄中整整有六个月。

在这期間，党於1926年十二月在五色温泉召開第二次党大会，把党擴大強化了。但因受福本主义的坏影响，党的方針居然想要造成完全是職業革命家的組織，以致党的組織和运动陷於停頓。共產國際反对这种方針，力主党的大众化，要求对福本主义進行批判。於是，为了徹底批判福本主义，党的負責人全部出席了1927年的执行委員會擴大全会<sup>①</sup>。在这次执行委員會擴大全会上通过了“1927年綱領”，实行对福本主义的徹底批判，党開始了劃時代的擴大強化。當時的總書記是佐野学，組織部長是渡边政之輔，实际的党的領導工作由渡边担任。这个決議的執行也是由渡边推動的，因此渡边对党作出了非常大的功績。我也在1927年从日本動身出席了这次执行委員會擴大全会，同年十二月回國。

### 因三·一五事件被捕

不久後總書記佐野到莫斯科去了，於是在1928年（昭和三年）的第一次普选時，渡边任總書記。通过大选，党出現在大众的面前，開始了党的大众化活動。这給統治階級以暴風雨般的強烈打擊，他們不久就用三·一五大檢举來向党反攻。由於这次檢举，六千人被逮捕了，其中二千五百人進了監獄，以後逐漸淘汰，实际上有七、八百人被判处罪刑。

我在这次大选中，从以小倉市为中心的福岡縣第三區提名为候选人，同時遭到了很大的失敗。选举的揭曉是在二月二十三日。我有被捕的預感，曾想从那裏繞道逃往东京，但是周圍的人都堅持說沒有關係，我接受了这种意見，決定經由門司从下關回去。然而，敌人为了防备我迅速逃走，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早就

<sup>①</sup> 指1927年五月十八—三十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会。——譯者

下手佈置好了。二月二十六日，我在門司車站前的一家理髮館裏理完了髮，剃光以前一直留着的鬍子，大大地化裝了一番，正在要從理髮館出來的時候就被捕了。不容分說，我就立即被解往東京，二十八日被投入高輪警察署的拘留所中。路上戒備森嚴，火車上有三個刑事警察跟在左右，在橫濱就下火車，換乘京濱電車到品川。這時我想，快到東京了，應該設法逃跑，但是一到品川，就有三十多個便衣和警察把我团团圍住，總找不到逃跑的機會，這樣就被送到了高輪警察署。在高輪警察署，開始了審訊。我憤怒地抗議說這是非法逮捕，使對方大為狼狽，趁機我便把身邊的証物當着刑事警察的面前若無其事地燒掉。他們一點都沒有發覺。後來我被裝在汽車上，被送到馬場先門街的污濁的木棚建築的警察廳，當時還沒有戴上手銬或其他刑具。汽車走到田村街的十字路口時，我曾打算逃走。從這個十字路口往右一轉彎就是“無產者新聞”的辦公處，往新橋方面走去就是東京交通工會的辦公處。不管逃到哪一個辦公處去，都有同志在那裏，很方便。有此打算，我就決定在汽車走到十字路口停下的時候，抓緊機會跳下去。車停下了。我剛跳下去一半，三個刑事警察就敏捷地捉住我的脖子把我又拖了回去。以後直到警察廳，他們都把我緊緊抓住，不肯放手。因此逃跑失敗了，那天晚上，再也無法可施。事後聽說，鍋山等人被捕時，全身五花大綁，絲毫不能動彈，然後被扔到汽車上。入獄後，我談起這次的失敗經過時，他們說：“原來是你闖的禍，我們沾光也挨了綁。”由於我最初企圖逃走，結果後來警戒變得非常森嚴，使別人遭殃。

在警察廳拘留了一個多月左右，我受到了種種的酷刑拷問，例如用針扎指甲縫等，但是既已被捕，我就具有犧牲的決心，什麼也堅決不講。於是敵人方面把一個比較伶俐的扒手送到我的監房裏來。我們本來住的是單間牢房，送進一個扒手來，這就是想通過他來探聽什麼消息。他不久就開始對我說，他曾在深川從事過運動，他還認識淺沼稻次郎。敵人好像希望我可能請求這

个扒手同外部联系,这样一來,他們就可以根据这个联系的綫索去尋獲証据。但是敌人的計劃失敗了。我不但沒有求他同外部联系,而且經過多次的談話加以追究的結果,使他从自己的口中說出他是一个扒手慣犯,因受敌人的指使而來到我的牢房的事实。他最後向我賠罪說,他十分对不起。於是,敌人又把當時从事工会運動而被捕的我的一个堂弟德田健次扔到我的牢房來。敌人的意圖是同前次一样。因为有了經驗,我一概不提有關联系的事,只和他談些別的話。最後敌人断了念头,把他另換到別的牢房去,又对我橫施拷問。

我依然如故,閉口不言。因而,敌人找不到証据,同時他們認為渡边和福本是党活動的中心,我是旁系人物,也就不再追究了。因为我是从福岡競选的,所以他們想,如果把我送到福岡就可以尋出証据來,过了十天,他們把我移到福岡土手街的看守所。福岡的同志們都被關在這裏。但是在這裏也得不到我的証据。而且,我在这裏对福岡的同志們大加鼓勵,敌人弄巧成拙,於是住了一个月他們又把我解回东京,送進丰多摩監獄。

在丰多摩,最先遇到的是志賀同志。他住在監獄中央部分,我住在監獄角落裏的房間。在運動時間,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初次知道了三·一五檢举的範圍。

在丰多摩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的,便是水野成夫入獄後嚇得滿臉發白,飯也吃不下去,在他的牢房前面總是放着稀粥。我立刻有这样的一种直覺,覺得这是个危險人物。剛剛入獄就垂头喪气的人,必定是危險的。这样人在獄中必然要叛变。水野一星期間差不多沒有吃东西,哭喪着臉。果然他後來背叛了党。他在供詞中寫道:“進入監獄听到牢房的門嘩啦一声鎖上的時候,感到有如墮入地獄的深淵。想起母親,想起父親,不覺流淚。”以後,他变成敌人的特务,向法院提出宣誓書說,願为破坏共產党而竭尽一切力量。他是最初“轉向”的人,後來,“轉向者”逐漸增多,以他为中心組成了最初的取消派。



## 佐野学等人的叛变

第二年(1929年)發生四·一六的檢举事件,在这以後,佐野学在上海被捕,其他主要的同志也被逮捕。

我依然不向敌人作任何供述。連主管的檢察官也因为我在第一次共產党事件時曾頑强抗拒的緣故,这次也認為訊問德田沒有什麼用处,完全断了念头,一次也沒進行訊問就交給預審推事。在預審推事審訊的時候,我仍舊不說。我对他們說,“讓我說也許是你們的職权,但是我有不說的權利”,从头起就嚴加拒絕,使他們什麼也得不到。然而,当我於1930年(昭和五年)看到佐野、鍋山、三田村、高桥等人的供詞時,不由得心中大为驚訝。

在这个記錄中可以看出,他們想要儘早出獄,因而完全中了敌人的詭計,为了求得早日獲得釋放,他們不管是否党的机密信口胡說。佐野和鍋山身為党的負責人,却說“自己不是黨員”,或說“自己虽是黨員,但和党只有一點點關係”。三田村一方面妄自抬高身價,同時由於焦急出獄,大大自吹說:“党的力量非常薄弱,什麼事情也搞不成”,“自己根本沒有把党放在眼中,只是为了由自己的手來啓發日本的工人農民而利用了党”。他为了菲薄党,举出了党內的許多事件。

这样,这些供詞記錄完全被敌人寫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党的真相完全被混淆歪曲了。事情到了我們必須对此進行鬥爭的關头。为了把党的真正的面貌及其为人民而鬥爭的实际情况向党外羣众和党内同志報告,無論如何必須進行陈述。我和志賀同志們商量,認為說不定我們什麼時候会死在獄中,因此決定必須把党的真相公開於世。以後我們就開始作預審的陈述。

但是在这裏,拿党來說感到受了伤害,同時拿我們來說,也產生了一種犯錯誤的端倪。本來我們在公審中只談党的政策就可以了,關於党的組織及其他事情沒有必要並且也是不應該向敌人陈述的。這些事情,因为佐野等人已經說過了,同時为了正

確地表示黨的真相，我們在公審中甚至不得不把這些不應陳述的組織及其他事情也加以陳述了。同時因為我和志賀同志開始了陳述，佐野、鍋山和三田村還惡意地利用這種情況誘惑其他同志說：“德田同志和志賀同志都開始供述了，你保持緘默也是無用的，趕緊供述吧。”這樣一來，我們給以後入獄的同志以不好的影響。我為了對抗那些人的錯誤和叛變，終於使我自己也犯了錯誤。直到今天我還後悔這種錯誤。

佐野等人從預審到公審中間清楚地暴露了他們是毫無政治能力的懦夫。後來他們都叛變了。他們因為一心想早日出獄，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黨的上面。這是根本的錯誤。所以敵人就提供了個人的利益，致使佐野、鍋山、三田村、高橋等人完全受騙而被利用為歪曲黨和破壞黨的工具。

任何人如果落在敵人的魔掌的話，千萬不要作敵人希望的陳述。不論刑事警察或檢察官說什麼樣的話，對付這種敵人的攻擊的方法有一個。那就是法律上所明文規定的：“自己有不說的權利”。所以，如果認為有不利情形，就可以加以拒絕說：“因為我有不說的權利，所以不說”。不論在有無共同被告的時候，都應當說有利的話。但是切忌說不利的話。因此，儘管敵人怎樣花言巧語，可以對他說：“如果你認為是那樣的話，你可以隨便寫成供詞記錄。我是有不回答的權利的”。我最初階段所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佐野、三田村等人便是上了敵人的圈套而隨口亂說的例證。因此，作為黨員的如果被捕入獄，絕對不可按照敵人的希望而信口雌黃。

### 公審鬥爭

總之，由於上述理由，我們的同志們準備進行公審鬥爭。我們被捕的同志共有 270 名之多，如果對這些被告要一個個地進行審訊的話，將不知要審判多少年。因而，本來想要單獨審判的反動官僚也為情勢所迫，不得不贊成舉行聯合公審。我們抓住

了敌人這一點。我們決定要求舉行聯合公審，有組織地進行公審鬥爭，正確地表現黨的面貌。我們的要求得到採納，從1931年（昭和六年）七月起，第一次公審以宮城實推事為庭長，在平田、戶澤兩檢察官監臨之下開庭。這次公審到第二年七月為止一直繼續了一年。

黨在公審鬥爭中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全體被告團結一致，顯明地表現出黨的面貌。為了這個緣故，從我們中間選出了委員，組織了法庭委員會，決定由委員會的委員作有關黨的整個說明，其他的人主要是陳述有關自己範圍的局部問題。這種辦法敌人也同意了。法庭委員會是由市川、佐野、鍋山、杉浦、國領、志賀、高橋、中尾、三田村和我一共十個人組成的。法庭委員會經常聚在一起商討怎樣來表現黨的面貌並一致地陳述黨的政策。這個委員會對我們非常有利，使我們能夠在獄中從事黨的研究和關於它的強化的學習。進行公審的一年間，直到大家陳述完了以前，法庭委員經常是出席法庭的。不論是為了公審的準備、為了公審的進行以及為了預審的準備，全體被告必須在監獄內外取得聯繫，這一點甚至法院也不得不同意。因而，能夠為釋放監獄內的人搜集了必要的條件。因此，沒有“轉向”的同志而情節較輕的人都陸續被保釋出獄，而“轉向”後已經出獄的人，也因為在法庭委員會指導之下進行公審鬥爭的緣故，階級的良心受到了責備，這對於黨的強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因為當時正是接連不斷的鎮壓和老同志的被捕使黨的鬥爭發生非常大的困難，所以這個公審鬥爭對於黨的強化，有了很大的貢獻。

佐野等人雖然對黨採取了這樣錯誤的態度，但是我們並沒有嚴厲地譴責他們。這是因為如果我們譴責佐野、鍋山、三田村、高橋等人的話，黨在獄中一定會完全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儘管他們是多麼壞的傢伙，我們認為，目前他們既然被推任為黨的負責人，那末為了團結全體黨員，為了把黨的整個面貌在羣眾面前表現出來，就應該說服他們，使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重新

走上正確的道路，這才是正當的辦法。根據共產黨的不成文法，對於在黨的艱苦期中犯錯誤的人，雖然要加以責備，但同時必須採取寬大態度使其進行自我批評而導向正確的方向。至於對於有嚴重叛黨的行為的，當然必須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但在開除以前應使其進行自我批評，遵從黨的方針，既然遵從黨的方針，就必須留在黨內使其充分活動。由於這種理由，佐野等人雖然犯了很大的錯誤，我們還是尊重佐野為黨的代表，法庭委員會也以他為中心進行了鬥爭。我在今天也認為這是正確的作法。不過當時我們應當使他更嚴格地進行自我批評，同時應當更充分地監視他後來的行動。我們在這一點是做得不夠的。他的自我批評以及對他的監視都不充分，未能對他作徹底的批評，使黨內大家知道全部實際情況，這是我們的重大錯誤。甚至黨內大多數人也不了解真相，因為僅在黨的幹部中處理了這一個問題，大多數黨員仍然無條件地繼續保持着對他的信賴，這後來對於黨成為一個很大的障礙。

總的說來，這次公審非常引起勞動人民的關心。在公審時無數的羣眾擁至法庭，佔滿了旁聽席。法院因為旁聽的人過多，事前發給入場券，人們為了領取這入場券在法院前面排成了長蛇陣。凡是在當天早晨來的人便領不到這為數有限的入場券，所以必須在前一天晚上就到法院前來過夜等候。對共產黨的徹底了解，是整個工人、學生和進步分子的不可抑制的要求。這種要求充分表現在這無數的旁聽者的擁擠前來。在旁聽者中還有另一種人，那就是反動分子和官僚。他們也不能無視共產黨的存在，同時受着要了解共產黨究竟搞些什麼事的好奇心所驅使，也有許多人願意來旁聽。但是他們並不像一般的旁聽者那樣從前一夜就來排隊。在普通公審時，按照慣例，這些人，特別是司法官，是在推事背後設席旁聽。但是，這次我們抗議說：“坐在推事後面的高高的座位上，從上面往下看我們是不合理的。”法院方面也贊成了我們的主張，在我們的後面設席作為特別旁聽席，

使他們和普通旁听者並坐旁听。这样，各部的高級官吏以及參、众兩院的議員和其他各种的人都來到法庭，甚至像新渡戶稻造那样人也來旁听。

公審第一天的情景是非常動人的，我到現在还没有忘記。我們長期間被分別拘禁的同志們，忽然在這裏相遇。有的人身体衰弱，完全变了样。有的人因为久別重逢，又感到高兴，又为彼此的顯著变化而感到驚訝，互相鼓勵以至流淚。

陈述終於開始了。本來預定先由熟悉法庭和法律的人來担当，但因佐野学最先起來陈述，結果弄得很沒有生气。敌人方面本來是有懈可擊的，而佐野並沒有擊中要害。实际說來，當時起訴書並不像个起訴書的样子。因为，對於共產党的定义，檢察官和推事的意見都是分歧的。平田檢察官說，起訴理由“有如預審的最終決定”，但是預審的決定却是对每个人都不相同。於是繼着佐野之後，我進一步質問說：“你們的起訴事实不是完全矛盾嗎？關於党的定义，在对全体被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这是与起訴事实的定义不合的。这样不能進行公審，应当从头另搞。”檢察官方面完全發窘了。如果对這一點再加以追擊那就好了，但是佐野学等却从中阻撓。其次是關於明辯共產党和私有財產制的關係的問題。敌人方面散佈謠言說，共產党否認私有財產。我在今天还時常說，共產主义者並不是否認而且也不能否認私有財產；存在着的東西並不会因否認而就不存在。

我在那時以前就抱有这种看法，並且还这样寫过。在法庭上，我也作这样主張來粉碎敌人的謠言。这样一來，法院方面就不能把“治安維持法”的“否認私有財產制……”一項罪名加在共產党人头上，所以窘於回答。我更進一步指出：“治安維持法是荒謬的。共產党並沒有否認私有財產的事实。”於是，对方完全狼狽了。但這時三田村又从旁插嘴救了他們。他說：“我們是否認私有財產的。資本主义是私有財產制。我們因为否認資本主义，所以否認私有財產。”資本主义和私有財產的內容顯然是不

同的。正是資本主義才使勞動人民陷入貧窮境地，使大眾的私有財產減少。私有財產決不就是資本主義。然而三田村却玩弄詭辯，模糊了我們的立場，而幫助了天皇制的審判。總之在法庭委員會中，我們正統派人數太少，所以在進行鬥爭上遇到了種種困難。就從這樣的一種內奸行為，後來他們便發展到“轉向”乃至公開地背叛黨和阻礙黨。

上村進、神道寬治、細迫兼光、布施辰治等三十人組織工農律師團為我們擔任辯護工作。但是，法院方面對待這個律師團是非常橫暴的。律師雖然在從事正當的辯護，但推事看到對被告有利的辯護時，就立即向律師開火。檢察官從旁支援，言外之意，以剝奪律師權相威脅。審判長還說這樣恫嚇的話：“請律師加以說明！”“律師對剛才說的話能夠負責嗎？”“律師所提的理由不是和治安維持法規定的內容相抵觸嗎？”特別是在律師揭露官方和資本家的毒辣，提到拷問的情形，並指出那些所提出的証據實際上是因被拷打不過而捏造出來，因而不能成為証據的時候，他們的態度更加蠻橫起來。所以，律師如不具有不怕被剝奪律師資格而勇敢發言的決心，他們就無法進行辯護。於是，我們被告們就不得不对律師加以庇護。被告站起來質問說：“對於這樣事實，你們到底有權阻止律師發言嗎？如果有，沒有問題。如果審判長無理地壓制這種正當的事實的陳述的話，審判長顯然是侵犯被告的利益，因此，我們也有我們的打算。”這樣一來，他們就退縮回去。因為，審判長的行動顯然有不利於被告時，被告方面也有權請求審判長迴避，甚至也有權上訴，所以我們就利用這種權利來庇護律師。這樣，事實反成了被告方面不得不替律師辯護的局面。

公審鬥爭開始時，外面發生了九·一八事件，軍部勢力猖獗，反動的空氣更顯得濃厚了。這種情勢也反映到法庭上，敵人方面在法庭上行使起暴力來了。有一次，審判長居然超過了在法庭上行使警察權的限度，瘋狂地跳到台上，指揮看守用手鐐來

打我們。曾有一次我在和律師講話，一個也不知是具有劍術三級或四級武藝的看守抓住我的領子把我提起，同時我也就把他一脚踢開。

第一審的公審後，1933年一月，德國法西斯反動政權一時得逞，反動勢力越來越顯得囂張。和外面的對共產黨的進攻相呼應，獄中對共產主義者的壓制也加劇了。佐野、鍋山、三田村、高橋等人此時完全向敵人屈服，開始对党進行破壞工作。1933年六月九日，他們終於發表了承認天皇制的“轉向”聲明。

1935年（昭和十年），開始舉行第二次公審。在第一審時爭取了聯合審判，而這次審判是把我們“非轉向派”和佐野等“轉向派”分別舉行。我們這方面由市川、國領、志賀、德田四人堅持鬥爭。這時雖然也有律師，但並沒有進行辯護。無產階級律師受到壓迫，不能為我們辯護，普通的資產階級律師只能代為傳達意見，所以我們就拒絕了辯護。另一方面，叛變党的“轉向派”方面由佐野、鍋山、三田村、高橋、杉浦等人共同開始了第二審。

這兩個法庭表現了鮮明的對照。我們這方面，因為這次不再有佐野等人那樣從旁阻撓，所以能夠指責推事所作的筆錄的矛盾，隨意自由地陳述。另一方面，佐野等人在法庭上大大地頌揚天皇主義，通過審判向外部散佈反動空氣。經過這樣的公審鬥爭之後，十月十七日終於宣判了。我被處十年徒刑，羈押期間共作四十天計算。其實我們在這以前已經過了六年的羈押生活，就在這羈押期間的計算方法上，敵人也發揮了他們的苛刻本能。

### 網走監獄和冰的“桂花糖”

這年十二月快完了的時候，我們突然被決定解往北海道去。志賀同志一個人被解往函館監獄，我們——市川同志、國領同志和我被解往網走監獄。他們用護送車把我們押送到上野車站，然後從上野坐火車，到達網走的時候已是年終的十二月二十七

日。北海道盖滿了一望無垠的白雪。

大家正在監獄中理髮。我的牢房的隔壁有一塊鋪着地板的空地，他們就在那裏一边吵嚷一边理髮。从吵嚷的声音中我立刻听出國領同志在那裏。他比我早來一步，是在四、五天以前到達的。

網走那地方气候非常寒冷，監獄的情況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屋頂很低，和外部空气接觸的地方都用紙密封着。

其中愉快的是，因为通暖气的關係，監房与監房之間的牆壁上開着个空窗。藉着这个空窗，一个人在牢房中大声說話，那附近的牢房都听得見，如果大声呼喊，声音就可以傳達到一、二十丈以外。因此，自己只要有勇气，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常利用这个來和同志們簡單地取得联系。這一點实在是很方便的。

食糧方面，就監獄來說，是比較富裕的。在監獄自有的土地中，有水田十三町步，連同旱地共有四百五、六十町步的耕地，大米虽然出產少，但是南瓜和馬鈴薯却出產得特別多。此外还有相当廣闊的山林，在燃料方面也不缺乏。要是天气不冷的話，就監獄來說，網走監獄可以算是比較舒適的。

只是，太冷了。那种不可言喻的徹骨的寒冷，使我對於六年的網走生活到今天一回憶起來依然有寒冷之感。

在嚴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並不稀奇。在这种時候，就是有暖气裝備的牢房裏也是零下八度或九度。呼出空气碰到牆壁時，立刻就凝結成为無數的“桂花糖”。“桂花糖”不只是出現在牆壁上。稍一不小心，眉毛尖和鼻尖上也都要出現。鼻子如果不經常注意用手去摩擦，就会像凍伤似地青腫腐爛。

夜裏，照例是脫掉短襟短袖的紅色工作服而換上睡衣睡覺的。但是在換上睡衣之前，必須砸碎水桶裏凍結的冰，用冷水摩擦全身。如果疏忽了這件事，把在零下多少度的嚴寒中凍得冰冷的睡衣立即穿在身上的話，馬上就要傷風而感染肺炎。睡覺時必須把头整个蒙在被窩裏面。在監獄中，普通怕有自殺危險，



禁止蒙头睡覺，但是這種規則是顧不得遵守的。要是把臉露在被窩外面睡覺，那末，在睡着的時候，由於自己呼出的空氣，嘴角周圍會完全被凍傷。初次從內地來到的人們，受獄方的強制，大都起初是露着臉睡覺，因而立刻受到傷害。

但是，把頭蒙在被窩裏睡覺，呼出的氣總是要從什麼地方的縫隙透到被外，所以在出氣縫隙的地方，被子就凍在一起了。在網走監獄特設有一個“被褥特別烘乾處”，每月兩次在那裏燒蒸氣烘被。要是疏忽了烘被工作，那末在被上就要冰上結冰，甚至結成一寸多厚。

總之，那地方是冷得厲害。我到網走的第三年，記得很清楚那是二月十一日紀元節的早晨，我睡醒後要想起床，不論怎樣也起不來。全身神經發痛，像是被錐子鑽着似的，腿和腰都挺不起來。甚至屋內近旁的馬桶也不能去。求人幫忙，我好容易才解了手，然後被抬到病房去，手、腿和腰部都施行注射，一個星期左右完全不能動彈，一直躺着。過了一星期後，勉強算是能夠起來了，但是從這時起，神經痛就成了我的終身不治之症。

從紀元節早晨起，拖了一年半左右之後，右手腕又不能轉動了。從肩骨縫到手指尖整個麻木不仁，右手完全不靈。這種狀態一連繼續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間工作也停止了。右手的不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痊癒，而成為網走生活的一種紀念。

### 監獄領有地的農業

網走監獄位於網走市郊的山中，够得上稱為北海道的監獄，它的規模頗為寬敞，據說從這邊到那邊有六日里<sup>①</sup>左右。獄吏巡視的時候，穿着騎馬服裝，騎着馬。獄中除總監外有兩所分監，我住的是總監，收容犯人八百人，第一分監二百五、六十人，第二分監距離較遠，約有六十人，總共收容約近一千二百名的

<sup>①</sup> 一日里約等於4公里。——譯者

犯人。

在这寬廣的地面上,有迫使犯人勞動的各种工作場所。首先,正如前面所說的,有水田十三町步、旱田四百五十町步。有為採伐山上的木材而設的鋸木廠。有利用这种木材而製造傢具等物的木工廠。還有燒炭廠。有綿羊五百隻,用手工紡織成毛織品,製造洋服。飼養六、七十頭乳牛,設有製酪工廠,出售牛乳。豬也有三、四百隻,當時供給軍用食品。供製革用和食品用的兔子也有五、六百隻。監獄臨湖,还能够捕魚。在湖上跑着汽艇,並築有裝卸貨物的小碼頭。此外,日用必需品工廠包括衣、食、住三方面,应有尽有。總括說來,整个監獄的土地好像形成了一個諸侯的領地。

在这个“監獄領有地”上,所有受到殘酷壓榨的勞動者就是這一千二百名犯人。

作為勞動者的犯人的工作,大部分是種田。種田是使用馬匹的。旱田還可以。水田面積寬廣,但收穫却太少了,如果三年能收穫一次也算是好的。第一,水稻根本就不出芽。即使好容易出芽,只長到一尺多高,也不開花。生長得好的時候,長到一尺五寸左右才開花,但是結的顆粒很空,實在够不上稱為大米。因此,一反地一般能收穫一包半或兩包大米就算是罕有的丰收。在這樣寒冷的地方種稻本來就是錯誤的,但是據說政府為了試驗在北部地方是否能種稻米,把網走監獄當作試驗場。所以,它也不過問是否能收成或收支是否相抵,這些一概不管,只要種了就得了。但是,試驗也並不是不可以,只是這種試驗實際上是在對犯人的極不合理的剝削的基礎上強迫施行的,其不可容忍的欺騙就在這裏。這樣做法好像用沒有底的水桶打水,徒勞而無功,監獄收入當然減少,結果就是犯人待遇的降低。

由於了解這種情況,犯人們都不喜歡耕種水田。在除草時,如果誰故意把稻根拔掉,那末,他就會被認為要不得而不再讓他到水田去工作。抓着這個竅門,我們就時常玩弄這種手段。當

然，在網走甚至在盛夏都不穿單衣，還要蓋冬天的棉被睡覺，除草這一工作本身也實在是一件又冷又苦的工作。

北海道的夏天的霧是有名的。這是在暖流與寒流相遇時產生的，在網走一帶特別嚴重，漫天籠罩着好像細雨似的濃霧。霧，在這裏一般稱為“瓦斯”，瓦斯不定什麼時候就會來的。而且瓦斯一旦襲來時就不得了，甚至在七、八月的盛夏，不穿棉衣不行。所以，夜晚不能大意蓋着夾被睡覺，整個夏天要穿夾衣。

稻米雖然不能收成，但另一方面在旱地上種南瓜、馬鈴薯、黃瓜、蘿蔔、茄子等，真是特別豐收。收成多的時候，我們吃這些東西都吃得發膩，每天三餐連續食用南瓜，胸中發燒，最後臉孔都變成黃色。

### 監獄的花

我的牢房是在靠門口最近的房間，在同一排牢房的另一端住着國領同志。

從牢房的窗口向外眺望，可以看到一片野草莽莽的原野，原野的對面是坡度輕緩的小山。原野和山，隨着季節的交替，變換各種各樣的服裝。在日日夜夜的寂寞的監獄生活中，這種悠閒的風景對我和國領同志，成為無上的安慰。

這種風景特別是在春天顯得分外美麗。悠長的嚴冬過去，春天就來到了枝頭。這裏那裏的樹枝上抽出眩目的嫩芽。那種鮮明的綠色在日本本部是根本看不到的。每當看到這種景色時我就想：日本本部的畫家無論如何也描繪不出這樣顏色來。

雪融化後，接着款冬和蒲公英便吐出芽來，很快地長大，真是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地長大，一個月的時間就長得有如內地三、四個月大。款冬長成五尺到六尺高。白邊竹也長有一人多高。

蒲公英雖然長得不高，但開着一片黃花，實在悅目。靠着蒲公英旁邊，馬齒莧像絨毯似地鋪滿原野。有紅色的，也有黃色的和紫色的。在這五色繽紛的野草中間，監獄飼養的兔子，彎着雪

白的背，到处奔跑着。这种美景簡直和監獄有些不相称。

### 做針綫活和紡綫工作

在監獄中的工作，起初是縫軍用手套（就是把軍用手套的帶有伸縮性的手腕筒子和手掌部分縫在一起的工作）。我因为手笨，这种工作總是沒有做好，後來做了長時期的針綫活：扎抹布，縫日本袜子，或是縫綫襯衣。袜子底是要用四种綫合在一起縫的，我起初縫的很不好，縫久了，逐漸變得熟練，最後達到藝術的境界。僅僅一双袜子要費整天的功夫，把各色各样的綫擺在面前，專心地、細緻地縫着。难友和看守們，看到这精細而巧妙地縫成的藝術，時常發出一声讚美：“这完全不像用一枚針做出來的！”

自从手坏了以後，我就只做些紡綫或淨棉花一類的工作。这是輕易的工作。因为，領來許多棉花材料把它纏在膝上工作，是非常暖和的。獄中的工作服長只及膝，冷的時候，手脚露在外面的部分並不覺得怎样，倒是从腰部到大腿很容易凍傷。要是把棉花纏在膝或腰部上，那就可以防止凍傷，所以这是难得的。听说志賀同志在函館監獄从事織魚網的工作，我們這裏則是學習做針綫活的技藝。因为有这一段經驗，我現在還能自己縫製襯衣或夾衣，至於縫袜子、絮棉被一類的工作，現在也能操之自如。

### 反对侵略战争的鬥爭

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但是一边虽然做着針綫活，一边我們决沒有忘記我們的鬥爭——我們对帝國主義者的鬥爭。我們不但未曾忘記，而且看到日本一年又一年地被驅向毀滅的深淵，我們不禁咬緊牙根愈益強烈地喊出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这种声音，尽管當時幾乎只是消失在獄中，但是我們仍然是不断地呼喊。

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們想如何開始行動，總是比他們自己

預見得還早。而且我們還清楚地預見到，他們沾滿血腥的手要把日本人民最後導向哪裏去。就是因為預見到這一切，我們始終對他們呼喊反對侵略戰爭，並為此目的，在獄外鬥爭，在法庭上鬥爭，更在監獄中繼續鬥爭。

如果把話稍向前追溯一下，那末，以滿洲事變時為例，情形也是如此。

當柳條溝事件<sup>①</sup>發生的時候，我正在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作關於青年問題的陳述。所謂青年問題，反對戰爭乃是它的主要內容。因為1930年年初發生大恐慌，當時人民生活極為悲慘。一卡車的農產物抵不到一支“救島”牌香煙的價錢。工人紛紛解僱，一天工資普通只有五角錢。為救濟失業而興建的土木工程，一般也不過賺三角或五角錢。這樣的社会情勢，對於帝國主義者來說，是驅使人民走向侵略戰爭的千載難逢的絕好條件。我在法庭上提出了這一點，並且斷定：日本帝國主義儘管現在還沒有拿起武器，實際上正在節節進行侵略的準備，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在中國東北和關內掀起了侵略戰爭的戰端。正在我作這種陳述的時候，聽到外邊響起了賣號外的鈴聲。那時並不知道是什麼號外，其實那就是報道滿洲事變爆發消息的號外。看罷，一切果然像我們所觀察的那樣進行着。而且這種侵略的結果如何，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時我想到國家和人民的將來，情不自禁地感到黯然心傷。

繼滿洲事變之後就是侵略全中國。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關內是我們在網走迎接第三個夏天的時候，這也不過是作為當然要發生的事情而發生了。在侵略中國東北成功之後得意忘形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們極力宣揚說：“這次全部取得滿洲以後，可以讓沒有土地的農民遷到滿洲去，完全解決了日本農民問題。農產物

<sup>①</sup> 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瀋陽市郊柳條溝附近製造炸燬“南滿鐵路”的事件，誣指為中國軍閥所為，並以此為藉口，發動侵華戰爭。——譯者

將要丰富了，鐵和煤也再不成問題了，今後日本民族就可以過舒服的日子。”他們用這種宣傳在人民中間煽動戰爭歇斯底里。但是，就在這時候，我們已經指出：農民的痛苦是解決不了的。日本人即使到中國東北去，在那裏進行日本式的農業經營，也決不會獲得成功。同時，他們以國防為藉口，盡量向中國東北的北方移民。但是北方所出產的農產物，除去運送到大連的火車運費之後，所得無幾。另一方面，中國東北農產物大量進入日本的結果，日本的農村將受到進一步的壓迫。因此，取得中國東北，日本農民只有變得更為悲慘。同時，中國東北固然有鐵和煤等工業資源，但為使貪婪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獲得滿足，這還是很不夠的。侵略的魔掌伸進中國東北之後勢必伸向中國關內，因而益將加深人民的痛苦。我們觀察到這一點，指出帝國主義者宣傳的十足虛偽性，並和他們進行了鬥爭。我們被解送到網走以後，每遇有機會，也對此事加以警告。但是帝國主義者却欺騙地把“賣國賊”的罪名加在我們身上，把我們關在社會的角落裏。他們按照既定計劃節節前進，終於邁出了侵略全中國而導向毀滅的第一步。

如果說侵略全中國是侵略中國東北的當然結果，那末，太平洋戰爭又是侵略中國的當然結果。由於了解這一點，1937年以後，我們在獄中舌敝唇焦地警告說：侵略中國決不會成功，日本軍部好像插足於泥沼似的，越掙扎泥足越陷得深，所以應該及早從中國關內和東北撤回手來，不然的話，將使日本捲入以全世界為對手的戰爭中。但是，熱衷於犯罪戰爭而頭腦發昏的帝國主義者們，不能認識中國新生的力量，反而把我們當作瘋人看待，以至使國家和人民陷於今日的悲慘境地。

在監獄中，可以听到的情報是有限的，但儘管如此，所有這種時局的發展都瞭如指掌。不管天皇政府怎樣想掩蓋事實真相，但對於總的方向事前有正確認識的人，只要听到情報的一小部分，就像填補被檢查的書上的空白字一樣，要在空白字的地方

填上个正確的字並不是什麼難事。

同時，眼看着一切正如我們所担心的那樣向前進展，實際上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加以制止而只能從事於縫紉工作，這是非常遺憾的。

### 受虐待的人最能够互相理解

帝國主義者以及作為他們的御用走狗的監獄高級官吏們，直到最後也不理解我們所說的話，但是在職位低微的看守和同獄的犯人中，却有許多人逐漸了解了我們的真意，逐漸認識戰爭的真相；我認為這一點是重要的。他們雖然沒有受到什麼教育，但是由於在現實中因戰爭而受到虐待的緣故，親身體會到戰爭就是為了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戰爭只會給人民帶來更大痛苦的這種道理。

自從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獄中突然改變了從前禁止看報的方針，不斷通過擴音器放送戰報，並准許我們直接聽收音機。這是積極煽動戰爭的政策。收音機帶來種種謠言。不用說，不斷宣傳戰勝的消息，同時還反覆宣傳日本是如何正當，中國是如何惡劣。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向犯人們說，在事實還沒有弄清楚以前，我們不可歌頌戰爭，而事實是今後逐漸會明白的，必須仔細加以觀察，認識這次戰爭的性質。我們還指出：這次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們有計劃地發動的侵略戰爭。軍部低估了中國的力量，這是一種錯誤。這次戰爭不容易收拾，結果將使日本捲入以世界為敵手的戰爭中，最後把日本導向毀滅。因此，我們對於這種侵略戰爭，必須團結起來發動反戰運動，以防止日本的毀滅。

當然，最初時期，多數人都是反對這種意見的。軍隊出身的犯人們，用盡所有難聽的語言來咒罵我們。但是，事實逐漸很明顯地變成我們所說的那樣，戰況漸趨不妙。因為日本軍部和資本家在大陸上做什麼勾當也逐漸明瞭了，所以他們也擦亮了眼睛，開始認真研究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且，我們還對他們

說明作為這次戰爭背景的日本國內的矛盾，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種矛盾的重大的犧牲者，所以我們的話，無不說中了他們的心懷。這樣，同伴們逐漸相信了我們所說的話。軍隊出身的犯人竟然成為最激烈的反戰論者。

隨着戰爭的發展，監獄勞動加速度地強化起來，這更使犯人們思想上發生了變化。這在社會上也一樣，不過，在獄中受到更加強烈的影響。我們對此也竭盡全力進行鬥爭。我們經常不斷地反對為戰爭利益而剝削勞動者和犯人。侵略戰爭不僅殺戮外國人，掠奪外國，而且殺戮本國人民和剝削本國人民，藉以使軍閥越來越發財。監獄中這種剝削是以最激烈和最露骨的形式強制進行的。這樣一來，起初是歌頌戰爭派的人們也不得不逐漸重新研究情勢的真正意義。

勞動的強化簡直到了驚人的程度。藉口是國家非常時期，做軍用手套，做彈藥箱，還編織海軍用的雜品囊以及其他種種的麻布口袋，還製造飛機的零件，而且往往是二十四小時毫不休息地繼續工作。

### 親切的犯人們

我們從被關進監獄後，不但始終沒有“悔改之意”，甚至在獄中還進行反戰運動，對於監獄的高級官吏，也許完全是敵對的。他們公開地或暗地裏向我們施加非法的壓迫。同獄的犯人們是我們衷心的朋友。因為不論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總是每次竭力加以袒護，所以他們對我們也是親切備至。

有一次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諾門坎事件發生的時候，為了麻痹犯人的思想意識，監獄方面在犯人中間舉行了讀經會以及短歌會和俳句會等，企圖轉移大家對於不利的戰況消息的注意。但卻附有共產黨不得參加的條件。我雖然什麼都不會，不過因為根本就嘴損，多少會一點“川柳”<sup>①</sup>。有一次雖然並不是在什麼會上，而是在大家面前，我把自己隨便作成的東西唸給大



家听，現在內容已記不得了，似乎是因为有些地方有趣，惹起大家哄堂大笑。於是，以引人發笑是不合理的和“妨害安靜”为理由，看守長立刻把我找去，宣佈懲罰我減食五天，停止運動五天，禁止讀書兩個月。我反駁說，我不記得曾妨害过什麼安靜，要他拿出証据來。看守長立刻把和我住在一起的犯人們召集起來訊問，但是沒有任何一个人說我“吵鬧过”。这个蛮橫的傢伙感到有些棘手，他最後說沒有証据也行，依然要实行懲罰。

禁止讀書兩個月簡直是胡鬧，懲罰減食五天也是过分殘酷的。到实行“減食”的時候，只在碗底盛一些有大錢厚的麥飯，同時菜量也隨之減少。總之，這是一种變相的絕食，繼續五天是受不了的。看守長本來是想讓我吃一些苦頭。但是，我却沒有感到什麼困難。犯人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心情，都知道我們是他們的朋友，所以在這種時候踴躍奮起相助。飯是因為在獄官面前分配的，沒有辦法可想，但是他們在盛湯用的鉄製大碗裏給我滿滿地盛着南瓜、馬鈴薯等，並且還分給我兩碗菜。因此，飯雖然減少，我絲毫沒有介意，減食五天後依然精神奕奕。

有關獄官的陰險，我又想起一件事來。我在市谷監獄時期和在網走監獄時期，一直和我的堂弟通信，在我到網走不久後，寄出的信便登載在“改造”雜誌上。當時因為家中貧窮，同時以為內容有趣就交給“改造”雜誌發表（聽說領取稿費五十元），據說事實上由於有趣的內容，這期雜誌銷路非常好。但是監獄方面對此感到不高興，為了反攻，他們放出謠言說，在我的首倡之下，市川、國領和其他兩三個人全都“轉向”了，这个消息立刻就登載在各地的報紙上。這是1935年秋天的事。

當然，我一點都不知道這種情況，有一天我因牙痛到牙科大夫那裏去才知道這件事。那個大夫問我說：“轉向時的心境怎樣？”我就問他：“哎！誰轉向了？”他說：“報紙上發表說你轉向

① “川柳”是日本短歌的一種，富有尖銳的諷刺性。——譯者

了。”仔細一打听，就像上面說的那樣，這使我大為驚訝。我立刻向監獄強烈地提出抗議，質問是誰說的那樣話，結果，監獄長因此引咎調職他處。他們以為我們在監獄中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作出這種卑鄙的事情來。在這次以前，當佐野、鍋山“轉向”的時候，也有謠言說我們“轉向”了，因此我的弟弟特地從琉球來看我。他們的捏造謠言和卑鄙無恥簡直是不值一提的。

### 死於獄中的同志們及其他

每當我想起網走監獄的生活，我就不禁想起殘暴的天皇主義者早有計劃地慘殺了同志們的事情。市川同志、國領同志都是拖着受盡折磨的身體鬥爭到最後而死的。

市川同志由於網走的寒冷患了劇烈的神經痛，後來胃腸也壞了，經常鬧痢疾。身體日見瘦削，簡直不像人樣，但是他並沒有訴過一次苦，從凹進去的眼眸中閃爍着炯炯的目光，永遠和犯人站在一邊，同不正當的監獄當局進行鬥爭。在我們被從網走移往千葉監獄以前，1940年一月，他因傷風感染了肺炎，由於他的身體本來已經衰弱到極點，病況立刻變得很嚴重，一時陷於人事不省狀態。談起當時的故事實在可以生動地說明他的本色。他的病嚴重了，獄方把他從監房移到病房。在這病房中，他一時暈厥過去了，看到這種情形後而表示高興的是監獄裏的和尚和看守長。他們把他當作是真正已經死了，趕緊打電報通知他的家族，又燒香，又唸經。然而，正在他們煞有介事地板着臉唸經的時候，重要角色的“老佛爺”憤然地坐起來了。他睜開眼看到周圍的情形，突然大罵一聲“混蛋！”我們看到本來已經死去的人，病弱到這種地步，突然能和平時一樣用雷鳴般的聲音咆哮着，又是驚訝，又是高興。但是在這裏最尷尬的却是和尚和看守長，他們大為吃驚，嚇得面無人色。

他因為在病房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被殺害，強硬要求回到監房，於是他立即回到我們這裏來。但是監獄對這種臨死的重病

人的作法实在是殘酷的。病人想要熱水袋，我們幾次向監獄交涉過，但是他們總是不給，最多只送來了些剩餘下來的睡衣。這樣，在北海道的一月裏，我們的病人終於不得不在沒有熱水袋的情況下睡着。然而，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時候，市川並未中止鬥爭。用這種堅強的力量，他最後戰勝了肺炎。

以後經過三個月左右，四月我們被移往千葉的監獄，從到千葉後，市川幾乎沒有吃過飯，經常是喝點粥。他因為牙齒不好，全部拔掉，重裝上了假牙，所以更不能夠吃硬飯。儘管如此，他總是振作精神，甚至在極痛苦的時候，也仍然起來工作，剛毅不屈，真令人欽佩。

國領同志是個非常正派的人，從來不犯任何錯誤，就是在獄中也始終以嚴格的態度和官吏們進行鬥爭。他也是由於寒冷和過度勞動的緣故患了胃腸病，因而消化力日見衰弱，患了便秘。因患便秘，飯也不能吃，胃也發脹，經常感到痛苦。但是，雖然受着這樣的痛苦，他的態度決不頹唐，正像他的意志一樣，永遠是崇高的，永遠是剛毅的。獄方因為他過分衰弱，企圖讓他“轉向”，特地把他的弟弟叫來，但他卻把他的弟弟痛斥了一頓。

他在1940年被解到奈良監獄去，最後和我分手的時候，已經成了皮包骨，面色蒼白得幾如死人一般。以後他病得越來越重，最後死於大阪。

大體說來，被送往網走監獄的就等於被有計劃地處死刑。我也患過全身神經痛，有一時期全身整個不會動彈。我在刑期接近終了時，移到千葉，又移到東京，才逐漸好轉，手雖然還是不好，但總算變得和普通人一樣了。如果仍然繼續在網走呆下去的話，那就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了。

特別令人不勝憤慨的，就是天皇政府對於財閥和右翼分子中被處徒刑的人的待遇。我最初被關進丰多摩監獄時，小川平吉被判处二年徒刑入獄。但是他在第二天就移住病房。一進病房就自由多了，飯也是特別準備的。後來聽說，他在病房中住了

一兩個星期，然後以病狀不見好轉為理由，就停止服刑而立即出獄了。這實在太輕鬆，只是到監獄來露露面罷了。也是在同一時期，桂太郎的心腹、大阪的浪華銀行董事長岩下周平，因侵佔公款被判六年徒刑，來到丰多摩監獄。但是他因有桂太郎和財閥們的人情關係，入獄後三、四天就停止服刑，到富士山下長期居住，結果以不了了之。這種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我們為正義而鬥爭倒反而被判處徒刑，這是沾了壞法律的光。但是我不想談這一點。只是使人無論如何不能緘默的就是這種差別的待遇。市川同志和國領同志在網走都確曾瀕於死亡的状态，然而天皇政府決不肯釋放他們，實際上一直到他們死亡並未釋放。所謂天皇政府的本質，正是如此。所以說送往網走就等於有計劃地判處死刑，決不是故意聳人聽聞的話。

### 獄中的讀書

我們在獄中讀書每個月規定四冊，特別交涉時，只再給一冊，但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五冊以上。

在一般犯人用的書以外，備有為了給所謂“思想犯”讀的特別書籍，因而，我們比一般犯人格外地能多讀一些書。在這些書中時常有好書，我們專喜歡讀這樣的書。但是，我們提出請求時，他們並不痛快地拿出來。他們主要是讓“轉向”的人讀，對於我們這些“頑強派”，尽可能加以限制。所以，如果真是想借自己想讀的書籍的話，必須和管借書的看守打成一片。

我雖然不是什麼行家，大小總算是個法律家，我就利用這種法律知識，給看守們充當法律顧問。他們做低級公務員的，差不多各人都有生活上的苦惱。或者為欠債而痛苦，或者被房東下了逐客令，或者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作學徒，有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於是，我就一一了解他們的這些苦惱，誠懇地幫助他們研究解決辦法。這不只限於法律方面的問題，隨着戰爭的進展，逐漸也擔任起經濟顧問的工作。物價不斷上漲，他們的薪金簡直無

法維持生活。生活越來越陷於痛苦的境地。他們處於這種景況，在經濟上应当怎樣辦呢，這也必須加以指導。我告訴他們說，趕緊買些棉布存下吧，或者買鐘錶及收音機等東西存下吧，大體上就教給他們這樣一些對於生活需要的智慧以及對將來的經濟上的預測。因為這些事情果然說得靈驗，所以他們也高興起來，感激我的好處，對於我所要求的什麼事也都提供了方便。在這種情形下，例如“日蘇年鑑”那樣一般極難借到手的書，我也能夠借閱了。當然，這種特別書籍，每月只限一冊。

最初時期我主要涉獵了有關佛教和日本古典的書籍。這些書，須看如何讀法，也可以成為有用的。例如，即使是一本佛教書，如果仔細地睜開眼睛閱讀它的話，你可以了解，佛教在所有時代中經常是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同時對於佛教和道德以及佛教和性慾等稀奇古怪的關係，也可以從那些令人感動似的文句裏得到透徹的認識。順便提到一件事：荒謬而滑稽的是關於極樂淨土的方位問題。現在一般說是西方樂土，但最初說是東方。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突然變為西方。不消說，這種荒謬的說法是所有稱為宗教的必然現象，一一向它表示敬意，是敬不完的。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sup>①</sup>等書，反覆閱讀兩三遍，也可以在它們的記錄中清楚地區別出來，傳達真實事實的部分，和作為編纂者的當時的統治階級為了粉飾自己而偽造的部分。例如，關於仁德天皇的部分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般說，這個天皇憐憫人民生活的疾苦，豁免了三年的賦稅，但是閱讀“古事記”上寫着這個事情的前後部分，人們就是不願意也會注意到，這個天皇的私生活是荒淫到什麼地步。當時的天皇不論哪一個，都是擁有許多妃妾，並且如果聽到有美女，不問遠近立即召入宮中，這本來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這個天皇的妃妾中有兩個是他的異母妹。

---

①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都是日本最古的史書。——譯者

在就任天皇之先，他就垂涎他父親應神天皇要从日向召入宮中的名为髮長姬的美女，終於据为己有。後來他又和皇后商量要娶八田若郎女<sup>①</sup>为妾，但被拒絕了，曾經一度擱下这个計劃，後來乘着皇后往紀伊旅行的時候，終於達到了目的。他还和他的弟弟爭奪一个女人(这也是他的異母妹)，因为未能順利進行，結果造謠說弟弟造反，把女的和他的弟弟都殺死了。總而言之，他是荒淫到了極點。像这种情形当然会使財政紊亂，人民非常痛苦。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情况是，當時日本社会正当一个巨大的轉變期，經由朝鮮不断輸入新的文化和物資，同時在內部也是由於原始的奴隸制度進入使用奴隸修建大規模土木事業的時代。我想也許是由於这种情形，費用非常龐大，結果使國庫空虛。因此，依我說來，三年沒有徵收賦稅也是由於無法徵收的緣故，既然自己把人民的米櫃弄空了，反而說是施恩於民，這簡直是笑話！我認為，如果强行徵收的話，就一定要發生叛亂。

閒話少叙，大体上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來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以及平安時代的色情文學作品，來讀歷史或其他古典書籍的。現代作品，暇時我也隨便閱讀。我對於戰爭期中盛行的軍國主義文學作品也很感興趣，因为它清楚地表現出日本帝國主義內部機構逐漸僵化腐敗的過程。

在西洋書籍方面，只有一小部分有關基督教的書，此外全是極端通俗的讀物，幾乎沒有一本是值得認真閱讀的。我多少也讀了一點聖經，但對於有關日本的書籍覺得更為有趣。

自從後來我對於自然科學發生興趣時起，我便專門集中在这方面。我起初讀些氣象學、海洋學，後來逐漸擴大範圍，一種接着一種地讀過造船、機械、農業技術方面的書籍。這些書比較多，因為是純粹自然科學，監獄方面也比較容易許可。他如工業經營論等，从某一角度來說是談論剝削問題的，這種書我也曾經讀過。

<sup>①</sup> 是仁德天皇的異母妹。——譯者

## 成为气象预测专家的经过

關於气象预测方面,今天我也算是一个小专家,这种技术是在網走时期学会的。预测的办法就是所謂“观天望气”,不用任何机械,看雲的变化,正确地预测当天的天气。这虽然有些原始的方式,但並不是沒有科学上的根据。

一般說來,在網走監獄有許多预测气象的专家。像前面所述的,網走地方後面臨湖,前面是海,而且这海面正当暖流与寒流成为交點的地方,气象的变化非常激烈,过不了兩小時就要突然發生变化。監獄在这个地方拥有寬廣的領地,从事農業工作,因此看守和犯人都非常關心天气。另一个原因是,到夏天時,被褥因霧气而受潮濕,立刻成为一个扁餅,必須經常加以曝曬。晒被褥必須選擇天气好的日子,同時天气又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發生变化,因此一定要不断地注意。由於这些原因,观测天气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而產生了許多气象预测专家,每天吵鬧不休地談論着预测对了还是预测錯了的話。

我每月只許讀四、五册書,同時苦於閒暇無聊,閒的時候就看天。起初認為看天總不至於担心会妨害安靜,但看的日子久了逐漸感覺有趣,对气象学也發生兴趣,終至成了癖。

除了一連六、七年訂閱中央气象台出版的“天气和气候”雜誌以外,書籍方面,我还讀了藤原咲平和岡田武松等人的著作。而且因为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關係,我又讀这方面的書籍,並連續閱讀了一年間的“海洋的科学”雜誌。隨着對於海底的狀態和气象的關係、風力和天气的關係、气象和雨量、气象和气候、气象和農業的關係的研究的進展,我對於一般自然科学也關心起來。

太平洋战争是在我移到本州的監獄以後開始的。战争爆發以來,無綫电廣播的天气預報也取消了,在本州監獄很少气象预测专家,所以我很受到重視。同時,因为我不能再以廣播的預報为参考,所以格外地費一番苦心。在每天規定時間,如早晨起

床、正午、下午兩點以及夜晚就寢時，我都測量气温並記錄气象的变化。因为沒有錶，我在獄中一听起床和吃飯的鐘声，便在本子上寫下來。这样，我逐漸積蓄了作为气象預測專家的淵博知識。當時的記錄本一共有六、七册，現在还保存着。

这次出獄後，我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農業的將來”的短篇論文，對於這，气象学及其他在獄中學習的東西起了很大的作用。

### 千葉、小菅、丰多摩、府中

从1934年年底到1940年春，前後七年中間，每天我們就这样度过網走監獄生活。1940年四月我被移往本州，進千葉監獄，以前在函館監獄的志賀同志也來到這裏，我們別了七年又重逢，感到無限欢欣。在千葉，生活比北海道時更加惡劣，吃的湯俗称“尿湯”，其中什麼也沒有，簡直坏到万分。不过值得高兴的只是吹着和煦的春風罢了。

在千葉住了一年多，1941年九月被解往小菅監獄，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小菅監獄我們的刑期滿了。实在說來應該早已滿期，因为在这前一年是所謂日本建國“兩千六百年”，那時曾給我們“減刑”一年又十個月。尤其是我們已在未判決前已度过六年監獄生活，再加上被判十年徒刑，到了現在自然談不到有什麼“減刑”。

不管怎樣，刑期既已滿了，就不能再放在普通監獄，我們被送入名為“預防拘禁所”的另一種監獄裏去。這時正当太平洋戰爭剛剛爆發，勝利的夢話喧囂一時。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被送到中野的丰多摩監獄，到停戰前的六月二十九日，一直住在這裏。後來我們又被移往府中拘禁所，過了一個多月就停戰了。

我們在拘禁所的四年間，外面物資也日趨缺乏，除了一部分的特權階級外，一般人民生活已陷入窮困的深淵。在這種時候，監獄雖然根本不會是舒服的地方，但是也坏得太过分了。由於



营养不良，我們中間也陸續有人死亡。

有如軍需工廠裏的管理人員偷竊工人的東西一樣，在監獄裏，官吏偷竊犯人的東西。拘禁所這地方本來規模很小，在這裏被從中揩油是無法忍受的。他們如果只是把我們的山芋偷吃一點，猶同小可，然而高級官吏竟恬不知恥地偷吃一般犯人如同餵豬飼料的囚糧，這在令人憤慨之先，首先使人感到可憐。

他們向配給所虛報人數，公然用卡車把多領的糧食運走販賣。他們偷犯人用的手套，偷布料、醬、醬油、鹽、油，什麼都偷。空襲加劇後，偷電燈泡的小偷也增加了。其中在空襲時，也有人自告奮勇願意留下，担当收聽廣播情報的職務，竟私自將真空管偷走。

這種非法舞弊到處橫行，只看到這種情況我們就能夠了解戰爭進行的情況。因而，我們覺得，我們出獄後為重建這破壞和腐敗到極點的日本而鬥爭的日子逐漸接近了。

### 戰爭結束前後

我們在十幾年的整個監獄生活中，總是相信我們出獄奮鬥的日子一定會到來的。我們一直在考慮着這些問題：那時我們將怎麼辦呢？為了拯救日本民族而使其脫離淒慘狀況，怎麼辦才好呢？我們應當怎樣建立新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呢？

不過，在網走時候所考慮的，可以說是一半接近夢想的計劃。但是回到本州以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特別是戰爭按照從前我們所警告的步驟發展並逐漸接近尾聲的今天，這已不能再是夢想了。我們在日益加劇的空襲下面，最後又一次提出這些問題，尽可能仔細地、尽可能具體地加以研究和計劃。

我們一找到機會，就互相交換意見，努力使我們的計劃不犯錯誤。特別是從移往府中監獄以後，由於空襲的緣故，獄方也讓我們讀報了，最難得的，是我們獲得了能夠頻繁地彼此見面談話的好機會。

在十月十日出獄之後，我們所以能够立刻重建日本共產黨，出版機關報，開始活躍的活動的，都是因为在監獄期間已經完全作好了準備。例如登載在“赤旗報”第一號的“告日本人民書”、“關於當前的各種政策”等，也是在獄中寫成的。同時我們預料到政府和資本家一定要實行生產怠工，所以我們認為，為了用工人的手來擊破這種怠工現象和重建日本產業，在對資本家的鬥爭的作法上，必須改變以往只用罷工的方式，而採取工人經營管理的方式；我們在獄中就訂出了這種計劃。這也寫在“赤旗報”第一號的論文裏面。

戰爭結束前後的幾個月，就是這樣匆忙地過去了。不顧麥克阿瑟統帥發佈的釋放政治犯的命令，日本政府故意緩慢地釋放我們，監獄當局對前來訪問的盟軍人士企圖隱瞞到底，但是，九月底我們終於被盟國新聞社的人們找到了。於是，長時期熱烈期待的新的鬥爭的日子終於降臨了。

1945年十月十日，度了十八年的監獄生活之後，我們打開了府中監獄的大鐵門，重新回到社會上。從1928年的三·一五被捕進入市谷監獄的候審監獄以來，正是第十八年。人們佇立在一陣陣的細雨中等待着我們。對於追懷十八年的悠久歲月而來慰勞我們的同志們，我只有點頭表示感謝。同時我在心中感到，雖然是悠長的歲月，但因生活單調，回顧過去，宛如黃粱一夢，令人感慨不已。

總之，擺在我們面前，急待去做的重要工作堆積如山。為了實行我們以前期待有這麼一天而想到的計劃，我們已不再躊躇，立即勇往直前，開始新的鬥爭。

### 結尾語

當我寫完獄中的經驗，我想寫另一件我目前痛切地感到的事情，這就是：監獄和社會，歸根結蒂是沒有什麼兩樣。

最初入獄的時候，我感覺監獄是被用高高的牆同社會隔絕

的特別所在。但是，隨着戰爭的進展和社會的變遷，逐漸了解這種感覺是錯誤的。監獄是社會的一種縮影。如果社會不改善的話，監獄也不會改善。監獄的殘酷，正說明社會也是殘酷的。在這次戰爭中，隨着社會逐漸變為不良和殘酷，獄中也如影隨形似地增加了不良和殘酷的程度。我們出來到社會一看，社會上的人們都變成像犯人一樣。

我們必須重建今天這腐敗和荒廢到了極點的日本，建設沒有矛盾的、合理的和富裕的社會。這樣做的話，監獄不久後也將變為合理的和富裕的監獄。我們的鬥爭就是為了這個，而且這一定是能夠做到的。

